

乾隆九年甲子御書《黃庭經》與剔紅神像經匣　1744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頂層



乾隆款剔紅神像佛經匣　佛教神像、背面款識　約1744年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FE.56-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2103_(50).0001

萬神方胙壽有餘
——清乾隆雕漆神像經匣的道釋神譜與寫經供養

詹鎮鵬*

【摘要】學界對清代（1644－1912）皇室與佛教的互動展開全面考察。清宮宗教藝術之研究向來以藏傳佛教為重心，涉及京城內外建造的一系列六品佛樓以及數量眾多的造像和法器。滿清帝王對其他宗教傳統的認知，囿於傳世文物及史料不足，一直難以深入探討。乾隆早期，皇帝交蘇州織造訂製一批供養御筆寫經的雕漆匣，器表雕刻之神像是道教與佛教視覺文化在清宮交融的稀見材料，迄今仍乏人關注。本文先分析經匣樣式及神譜構成，藉助造辦處活計清檔去重組其設計過程，再結合高宗的寫經活動與供奉場景，比較他在兩大宗教的供養人角色。

經匣設計與御書經冊相配合，供奉於紫禁城內多間道教宮觀及佛堂，表明官方宗教活動的重心雖然在於藏傳佛教，道教仍是皇室祭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雕漆神譜濃縮了乾隆皇帝對佛道二教的宇宙觀，反映其常年定期抄經、事神禮佛，祈求靈驗之虔敬心態。神像經匣與寫經共同構建宗教聖物，作為頭位供奉品的重要性延續至清末，除為帝王個人祈福延壽之外，亦具有護國佑民的作用。

關鍵詞：乾隆皇帝、道教、藏傳佛教、雕漆神像、寫經供養、宗教聖物

前言

龍興自滿洲的清代（1644－1912）帝王在宗教領域的贊助，尤其是雍正（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1723－1735在位）、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6－1795在位）對佛教的重視，與同為北方邊疆民族建立的蒙元（1271－1368）政權的崇佛政策一脈相承。乾隆皇帝對格魯派為首的藏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佛教之扶持，更涉及羈縻西藏、蒙古兩大邊疆區域的政治考量。① 近二十年，藏傳佛教在清宮內外的影響力，在文化史、新清史學術浪潮推動下，常被視為滿清皇權統攝神權，進而構建自身帝國特質的重要基石之一。② 乾隆十年（1745），三世章嘉・若必多吉（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1717－1786）傳授乾隆帝「入乘法灌頂」，以及密教轉輪聖王「勝樂灌頂」之法，標誌格魯派為首的宗教力量與清朝統治者的互動，臻至頂峰。③

以此為基調，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清代宮廷與佛教的互動展開全面考察。清宮宗教藝術之研究向來以藏傳佛教為重心，涉及紫禁城內外建造的一系列六品

① 乾隆帝在耄近歸政之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寫《喇嘛說》，以滿、漢、蒙、藏文四體合璧，刻碑於雍和宮內，大意就是告誡其子孫後代「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根本宗旨，闡明此乃「所繫非小」的「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大政方針。

② 清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指出，十八世紀乾隆以滿族為主體，針對漢、蒙、藏、回、苗各不同地域和族群制定相應的文治策略，進而發展出一種廣納各種意識形態且「包庇天下」的共主皇權（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參見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有關盛清研究在新世紀的學術轉向，參見Evelyn S. Rawski, “Re-imagin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1, no. 1 (Fall 2003), pp. 1-29;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 白瑞霞（Patricia Berger）和周文欣延續北美新清史提出的命題，考察清宮藏傳佛教藝術贊助與滿藏蒙的多元交流，見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 5-9; Wen-shing Chou, *Mount Wutai: Visions of a Sacred Buddhist Mountai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182-183。王子林結合《高宗純皇帝實錄》，依據皇帝在乾隆十年末的行程主要在紫禁城內，推測他是在中正殿接受灌頂。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依據雍和宮在乾隆九年之改建，推定乾隆改建喇嘛廟的目的之一，是在宮內接受三世國師章嘉灌頂。參見王子林，《紫禁城原狀與原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下冊，頁299-306；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佛樓以及數量眾多的造像和法器。④ 藏傳佛教的主導地位自不待言，皇帝對其他宗教傳統的體認，囿於傳世文物及史料不足，一直難以深入探討。清宮舊藏的一組乾隆款剔紅經匣，器表雕有獨特的道教、佛教神像。筆者通過耙梳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確認其為內廷在乾隆早期傳交蘇州織造置辦之物，具有上佳的工藝品質，體現出漆工藝特殊的宗教用途。乾隆朝御用漆器之置辦與蘇州這座明清時期商貿發達的東南都會淵源甚深，雕漆活計更是集中交予當地織造署監造，地方大吏亦時有進貢。⑤

環繞太湖的江浙地區一直是漆器的生產及消費中心，⑥ 盛放經書、佛骨舍利的漆質容器也隨之衍生。兩宋（960－1279）至明代（1368－1644），鮮見雕漆剔刻神像之例。漆工藝應用在盛經容器的早期範例，見於晚唐至五代（907－979）的吳越地區。1986年在浙江湖州市飛英塔壁間出土的一件嵌螺鈿漆經函，木胎長方匣呈盝頂造型。立墻四側運用嵌螺鈿描繪了釋迦牟尼說法圖，連同護法神、供養人和佛弟子眾人形象，蔚為大觀。底板外部朱書題記，記此函是吳越國順德王太后（913－952）在廣順元年（951）施造，用於天臺山寺院供養佛經。⑦ 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同套的經函和舍利函，函底題記帶「大宋慶曆二年（1042）」紀年，為北宋（960－1127）早期製品。函體施漆灰堆塑和金筆線描技法，營造出富麗而不失莊嚴的佛國世界（圖1）。⑧ 藏傳佛教盛行於明初皇室，佛教供器、隨葬器具常施朱漆戧金紋飾，如散見公私收藏的一套飾八寶

④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⑤ 明清雕漆器以剔紅為大宗，相關工藝歸入明隆慶（1567－1572）《髹飾錄》「雕鏤門」。做工要求極高，須在漆器胎體（竹木、金屬、麻布等）完成灰地後，進行反覆髹漆，漆層堆積至合適厚度之後，用刻刀在未乾透的漆層上剔刻出花紋圖案。地方官員在蘇州訂製雕漆用以御貢的研究，參見詹鎮鵬，〈帝國紀勳與地方貢品：乾隆朝《平定臺灣得勝圖》雕漆掛屏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5期（2018.9），頁189-281。

⑥ 關於宋元至明早期的江浙漆工及風格演變，參見詹鎮鵬，〈朱髹增華：明初（1368-1435）官用剔紅器及其相關意涵〉，《故宮學術季刊》，34卷2期（2016年冬），頁1-71。

⑦ 朱書題記共四十七字：「吳越國順德王太后吳氏謹拾寶/裝經函肆隻入天臺山廣福金文/院轉輪經藏永充供養/時辛亥廣順元年十月日題記」。參見陳晶主編，《中國漆器全集4 三國—元》（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8），頁63-65，圖59。

⑧ 陳晶主編，《中國漆器全集4 三國—元》，圖60-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紋的夾經板（圖2），從屬永樂九年（1411）在南京以明成祖（朱棣，1360－1424）命人取自烏思藏的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為藍本雕版印製的經文（一百零八函）所用。⑨

盛供高宗御筆寫經的雕漆經匣，工藝材質及圖像設計上未見先例，迄今仍乏人關注。重視盛放內容的思維模式，令故宮藏品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御筆寫經的附屬品，其獨特的神像組合仍有待識別。⑩ 另一部分流散海外的經匣因寫經佚失，導致情境缺失，亟需藉助檔案去追索功能。綜觀考古發掘及傳世遺物，舍利函、經匣一類重要器物多為施用貴重材質和精巧工藝的奢侈品，以強烈的視覺效果營造出佛國莊嚴。這種視覺祥瑞也賦予它們超脫一般容器的聖物光環，可視之為表現佛陀的肉身或法身的象徵載體。⑪ 晚清故宮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常將該批雕漆經匣記作「神像匣」，不僅淡化盛裝經書的功

⑨ 除筆者在大英博物館寓目的《大聖廣開真義經》經板（1992,0129,0.1.CH），東京東方漆藝研究所藏《華嚴經》經板、臺北故宮藏《律師戒行經》經板、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賢劫千佛名經》經板、私人藏《妙法蓮華經》經板等，均兩片一副，制式固定。朱漆戧金長方板面外緣飾寶相蓮紋，中心刻佛教八吉祥紋，以配合經文教義，板內刻陰文經名，左藏右漢，二體對照合璧。

⑩ 北京故宮館員更將盛放御書道教黃庭經的神像匣誤植為「佛教故事經匣」，將多件佛經匣（附錄2.2-2.5）定名為「雲龍羅漢圖長方匣」，說明除神祇名號及組合未經辨識外，兩種神譜也因構圖高度一致而容易混淆，參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110。筆者認為匣盒包裝在清宮物質文化研究有待重視，除滿清帝王重視文物的包裝收納而創立「匣作」外，高彥頤（Dorothy Ko）也留意到雍正、乾隆有悖於漢人傳統，常會以匣盒為主題進行組合配置，進而賦予其獨立意義，見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p. 39-43.

⑪ 中古時期的舍利容器之新近研究，從風格分期、瘞埋規制，開始關注公開展示及迎送活動，見于薇，《聖物製造與中古中國佛教舍利供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佛教舍利容器的象徵性與西歐基督教盛逝去聖人的相關遺物（relics）的聖物箱（reliquary），在構建聖物上有相通之處。此類通過觀看、觸摸等感知行為構建集體認知的宗教視覺文化，被藝術史家David Morgan總結為 “sacred gaze”，參見David Morgan, *The Sacred Gaze: Religious Visual Cul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也強調立面神像在公共展示場景中吸引觀者（清點人員）的視覺效果。⑫

筆者在重組神像經匣與原配經書的陳設原狀之同時，主張前者具有與御筆寫經同等重要的研究價值。雕漆神像不僅是道教與佛教視覺文化在清宮交融的稀見材料，更直觀地反映出乾隆帝對兩大宗教的理解認知與信仰態度，由此出發，有助進一步觀察其供養人角色。本文先分析經匣樣式及神譜構成，再藉助清宮內務府檔案去重組其設計過程。最後，結合乾隆皇帝的寫經活動以及供奉場所，比較他在佛道二教的供養角色，提出神像匣與御筆寫經共同構建宗教聖物的象徵意義。

一、全景式神譜：神祇組合與構圖風格

乾隆款神像經匣存世至少十二件（見附錄一、二），散見全球的清宮藏品以北京故宮為大宗；皆為木胎，紅面黃地雕刻圖案。按盛經形式及書款位置分成立式、橫式兩種。立式匣另帶須彌木座，安供時立於其上，凸顯規格（附錄2.4）。橫式匣僅有一件，用以盛供佛教《楞嚴經》。本節分析道、釋神譜之構成，再比較二者的構圖風格。

（一）道經匣神譜構成

神像道經匣現存兩件（附錄一），皆為立式，其一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一為海外私藏。⑬ 前者原配《黃庭內景外景經》二卷（書9570），係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墨筆楷書寫本，兩冊合裝於仿宋錦函套內，盛放在雕漆匣。器體通高約34.5公分，通長15.5公分，寬8.6公分，底設須彌座，仰覆蓮瓣。正面雕刻道教神仙人物，背面刻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兩側刻雙龍戲珠，底緣海水江崖紋（圖3）。

⑫ 結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及陳設檔，本文將該批雕漆經匣統稱為「神像經匣」，以便區別於其他同類器物。

⑬ 本品流出宮禁後數易其手，匣面年款「清乾隆」三字被挖走，後歸美國歐雲伉儷（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收藏，2019年3月經紐約佳士得（Christie's）春拍（Lot 809），見附錄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面雕逾150位道教神祇，連同天空兩對帶翼仙人，合共155位人物。祂們在中軸龍紋丹陛之兩側依次分列，以橫向欄杆為界限，可分成四個層級（圖4b）。頂層以玉皇大帝為至尊神，居中端坐在御座上，身穿冕服，頭戴冕冠，手持玉圭，背後有圓形頭光（圖5）。其身後有三聯屏，屏芯刻流雲紋，背面空間放射平行線組成的瑞光。最高等級的冕服及冕冠，借用君王形象描繪玉帝等四御男主神，明清時期已是固定格套（圖6）。上空雲霧繚繞，各有一對帶翼仙人。玉帝兩側一對侍童，手捧鉢狀物。左右排列一眾真君天官，身著長袍，排前者手持笏板。兩端各立有北極四聖之天蓬、天猷元帥，呈忿怒相，額帶三目，三頭多臂，上身赤裸，飄帶繞肩（圖7）。天蓬六臂分持日、月、弓、箭、鈴（帝鐘）、戟，天猷四臂分持山巖、漩渦、劍、戈矛。⑭

第二層中軸，黃色錦地有一尊三足鼎爐。位列在丹陛兩側者，分別是北極四聖之真武和翊聖（又稱黑煞），披髮而立：真武居左，跣足仗劍；翊聖居右，額帶三目，手執鐵鞭（圖8）。其前排共十位雷部神將，依據手持法器，部分名號大致可判。例如左側中央執大刀的人物可能是關羽，右上方持長戟的人物似有三眼，戟上有纏蛇，很可能是馬元帥。其餘兩人均面帶鬚髯，就所執節鞭、棒、圓環諸法器來看，應該是溫元帥與趙元帥。四者組合在明代被稱為「四大元帥」，是從屬真武（玄天上帝）麾下的神將。較早的相關圖像可見於《天尊圖》（奈良法隆寺藏）、《天帝圖》（圖9，東京靈雲寺藏），馬、趙、溫、關四位元帥作為玄天上帝的部屬，分列其左右。⑮ 最右端的鳥喙人首者有

⑭ 北極四聖（天蓬、天猷、真武、翊聖）在朝元圖及水陸畫或共同出現，或兩兩組合，天蓬、天猷普遍是三面多臂（四臂或六臂）的密教武神，手臂持物在道經及圖像並不穩定。天猷上二臂分持漩渦（海）、山巖（山），相對罕見，或是象徵其職權及巡遊範圍：「上佐北帝，下臨九州……五嶽巡遊……名列金闕，位鎮酆幽。蒼禽獅子，巨海虬龍，三十萬兵，從我周遊。」《太上九天延祥滌厄四聖妙經》，收入《道藏》，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809c-810a。

⑮ 法隆寺《天尊圖》、靈雲寺《天帝圖》二軸之圖版，參見齋藤龍一編集，《道教の美術》（大阪：読売新聞大阪本社，大阪市立美術館，2009），圖81；Stephen Little and Shawn Eichman et al.,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0), no. 108, p. 300. 在明代，玄天上帝傳有三十六神將作為部屬，以四大元帥為代表，其道法組合普遍用於驅邪禳災的雷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能是鄧天君或陶天君。左右兩翼各有一名虎頭人身及龍頭人身的神將，其形象也出現在御書《黃庭經》的經首扉畫中，或代表白虎君、青龍君。

第三層分列48位人物（圖10），其中最上端的十二位仙聖頭戴通天冠，著長袖袍服，雙手捧圓形物，內有動物形象，身份當為十二辰：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圖11）。根據王元林的研究，十二辰自五代時期已出現長袍裝扮，手捧十二生肖的禮儀性形象。⑯ 相關神祇的特徵表明，這套圖像傳統仍延續至明清。

十二辰下方，左側一組四位人物，戴文官常見的璞頭冠，手持文簿；右側四位戴冠，扎頭巾，手捧遠大於笏板的條狀物，應是表文，分別代表四大判官及四值功曹（值年、值月、值日、值時）（圖12）。北京白雲觀一套重彩設色的清代《諸神朝元圖》中，神祇被雲團分成四組，在前排靠外側手持表文的功曹，以及持筆和生死簿的判官，分列左右，冠式及法器與經匣形象大致吻合（圖13）。⑰

中軸是護法神靈官王元帥，長髯，三目，戴頭巾，身披鎧甲，右手持帶節鐵鞭，腳踏一火輪（圖14、15）。分列同一層的其餘仙聖皆穿長袍，頭戴通天冠及蓮花冠，雙手持笏板，置於胸前，形貌高度一致，難以辨識。尹翠琪將明正統（1436－1449）《道藏》扉畫與多間道教及水陸壁畫的神祇組合進行比較，推測戴通天冠者很可能是宇宙自然次級神祇，包括星君、水星、三官等；戴蓮花冠者普遍是天尊、祖師。⑱

位列第四層的兩組人物是二十八宿及神將。二十八星宿分列左右，其中帶馬頭、羊頭、猴頭、鳥頭、豬頭、持蛇者，可能對應星宿、鬼宿、觜宿、昴

⑯ 王元林，〈東亞地區墓葬壁畫十二辰圖像的起源與流變〉，《考古學報》，2013年第3期，頁325-346。

⑰ 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197-198。

⑱ 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3期（2017.9），頁25-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宿、室宿、翼宿（圖16a-b）。⑲ 祂們與下層各持兵器的神將之間，被雲層包裹，相互區隔。護法神將共約二十五名，雖身披鎧甲、手持各式兵器，但多數難以判定名號。值得注意的是，右下角一位頭戴寶冠的神祇，呈女相，三頭多臂，上兩臂托舉圓形物，另兩臂合掌於胸前；右側有一名宮裝侍女，側身向左方合掌禮拜（圖16c）。戴冠女神與斗母（又稱斗姆、斗姥）在明清時期三頭八臂、上臂托日月的流行形象高度吻合（圖17），推定祂的身份即是斗母，身旁應是隨從侍者或護衛天女。⑳

（二）佛經匣神譜構成

乾隆款神像佛經匣共存十件（附錄二）。立式匣散見北京故宮、南京博物院、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及私人收藏，㉑ 通高約34.5~36公分，長16~17公分，寬7~8.8公分。形制及尺寸與道經匣相同，底承仰覆蓮須彌座，一面雕刻佛教神仙人物，與之相對的背面，中央刻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兩側飾雲龍、海水江崖紋（圖18）。立墻及頂部雕游龍。

所有立式匣中，附錄2.9的私人藏品具有鮮明的風格差異：第一，比對其他經匣，它的底座偏高，令器體通高近37公分。第二，其兩面立墻雕雙龍對峙，靈芝形卷雲紋為地，邊框帶連續回紋；其他立式匣均飾單條游龍，底接海水江

⑲ 二十八宿對應四象及七曜，如下表所示：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東方青龍	角木蛟	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北方玄武	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豬	壁水貐
西方白虎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南方朱雀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

⑳ 相關研究表明，道教斗母的多臂、三目形象與密教摩利支天（Marīcī）存在借用關係，參見鄧昭，〈道教斗姆對密教摩利支天形象的借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6期（2014.3），頁59-108。

㉑ 蘇黎世闊樂（Koller）和巴黎蘇富比（Sotheby's）拍賣行在2010年9月、2017年6月各拍出一件乾隆款剔紅神像佛經匣，其中前者僅存神像扉板，見附錄2.9、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崖紋，邊框光素無回紋。第三，神祇數量及構圖雖一致，人物輪廓及雕工有細微差異。筆者推測該例與其他經匣並非同批製品，容後再論（詳見下節）。

北京故宮藏有橫式經匣一件，盛御書《楞嚴經》十冊（書9502），形制近似正方體（高28公分，長26公分，寬25.2公分）。㉒ 立式匣僅一面雕刻神像，共134位人物。楞嚴經匣的四面立墻刻神像，構圖不變，空間比例與人物分佈微調，各有132位人物，邊框飾連續回紋。其次，為呼應經冊橫置朝上方向，「乾隆御書楞嚴經」隸書豎款位於匣頂。款識周圍施海水卷雲紋為地，刻畫四海龍王、二護法神將、羅漢、侍女等眾，合共46位人物（圖19）。

佛教神仙人物與道教神譜相同，集中四層呈中軸對稱分佈。釋迦牟尼佛（Śākyamuni）作為至尊神，結跏趺坐在仰覆蓮須彌座上，右手下垂，施觸地印。頭覆華蓋，間以金翅鳥（Garuḍa）。須彌座飾「巴達馬」蓮紋，中部束腰飾獸面，或象徵「榮耀之臉」（Kirtimukha）；㉓ 獸面紋左右各有一名赤膊力士，呈單臂托舉狀。釋迦牟尼佛與兩側下方的彌勒佛（Maitreya）、燃燈佛（Dīpaṃkara），作為三世佛，組成一主二副的主神（圖20）。

頂層以釋迦牟尼佛為中心，兩端各立一座藏式覆鉢佛塔。左右兩脅分立二弟子，帶頭光，兩旁一眾著寬袍俗裝者，無頭光，或是天女，手持八寶、佛缽、方勝瑞物，向主尊獻供（圖20）。第二層以未來佛與燃燈佛為中心（圖21a），前者吸收了布袋和尚作為彌勒化身的形象特徵，袒胸露腹，大肚，右手掐串珠。

三世佛前方，密宗八大菩薩結跏趺坐於蓮臺，身披帔帛，戴頭冠，自左向右分別是：金剛菩薩（Vajrapāṇi），手持金剛杵，置於胸前；地藏菩薩（Kṣitigarbha），頭戴寶冠，手托鉢狀物；普賢菩薩（Samantabhadra），左手持如意；除蓋障菩薩（Sarvanivāraṇa-Viṣkambhin），三面多臂，戴化佛天冠，上二臂分持劍、寶傘；虛空藏菩薩（Ākāśagarbha），三面多臂，手持劍、寶幢、蓮

㉒ 李久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漆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頁38-39，圖24。

㉓ 尼泊爾、藏地裝飾流行的獸面圖案 *kirtimukha* 最早源自古印度濕婆神話，其早期演變參見Gautama V. Vajracharya, “Kirtimukha, the Serpentine Motif, and Garuda: The Story of a Lion that Turned into a Big Bird,” *Artibus Asiae*, vol. 74, no. 2 (2014), pp. 311-3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等；文殊菩薩（Mañjuśrī），右手托經；觀世音菩薩（Avalokiteśvara），混融明清流行的白衣觀音形象，頂披紗巾，手捧瓶狀物；彌勒菩薩（Maitreya），持物難以識別。身後站立一排薙髮人物，應是佛弟子或羅漢，左右各列七位。中軸地面有雲氣昇騰，蓮花托起一鉢狀物，從中吐出三顆放射焰光的寶珠，可能是象徵佛法僧三寶。

第三層（圖21b），十位三面多臂者為十大金剛明王（Vidyā-rāja），呈忿怒相，三目，赤裸上身， 鬚上豎，肩披飄帶，手執多種法器：弓、箭、劍、金剛杵、戟、鉞斧、日、月、經、寶珠等。根據造型、持物組合，分別應為焰鬘得迦明王（Yamāntaka，降伏閻魔）、無能勝明王（Aparājita）、馬首（頭）明王（Padmāntaka）、甘露軍吒/甘露軍荼利明王（Amṛta-Kuṇḍali/Vighātāmṛta）、降三世明王（Trailokyavijaya）、大笑明王（Vajrahāsa）、步擲明王（Padanaksipa）、大力明王（Mahābala）、不動尊明王（Acala）、大輪明王（Mahācakra）。明王是佛教密宗內佛和菩薩的一種忿怒相變化身；依據密教經典和圖像儀軌，主要分「八大明王」和「十大明王」二種。㉔ 雕漆神像上，十大明王平均分在左右兩側，空間佈置基本承襲了元明清漢地民間流傳的水陸儀軌和相關作品中明王作為十方法界的護法神的地位，例見山西保寧寺明代水陸套畫、河北石家莊毗盧寺毗盧殿的明代壁畫、山西渾源永安寺水陸壁畫。這些三面多臂的尊像與《三百佛像集》等展左而立、頭戴骷髏冠、裸上身、腰圍虎皮裙的藏式明王的風格截然不同。㉕

㉔ 《大妙金剛大甘露軍拏利焰鬘熾盛佛頂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經號965）指出八大菩薩尊身現作八大金剛明王：金剛手菩薩現作降三世明王、妙吉祥菩薩現作大威德明王、虛空藏菩薩現作大笑明王、慈氏菩薩現作大輪明王、觀自在菩薩現作馬頭明王、地藏菩薩現作無能勝明王、除蓋障菩薩現作不動尊明王、普賢菩薩現作步擲明王。在唐代（618－907），達磨栖那（生卒年不詳）譯出該經，衍變出八大明王圖像。宋僧法賢（？－1001）譯《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8冊，經號891）體現出十大（忿怒）明王在幻化曼荼羅中的護持法界作用。故八大明王更強調明王為菩薩應現化身，十大明王體系強調其護持曼荼羅（壇城）十方的功能。

㉕ 廖暘比較了山西稷山青龍寺腰殿元代壁畫、山西寶寧寺明代水陸畫、河北毗盧寺水陸畫、山西繁峙公主寺大佛殿中十大明王的空間分佈，並根據佛典譯本的尊像梵名，指出密宗不同體系內十大明王（宋密）與忿怒尊（藏傳佛教）的異同。廖暘，〈甘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第四層主要包括四大天王（Caturmahārājakayikas）、十八羅漢（圖22）。以包裹人物的雲團為界線，大致劃分出上、中、下三段。上段集中了護法神將，以持蛇的西方廣目天王（Virūpākṣa）、持寶劍的南方增長天王（Virūḍhaka）、持寶傘的北方多聞天王（Vaiśravaṇa）、持琵琶的東方持國天王（Dhṛtarāṣṭra）為首。中段集中一組共十八位薙髮人物，中軸左側的羅漢一手持法杖，一手撫摸膝下虎頭；右側一位羅漢持鉢，其降伏的龍從鉢中湧現，表明二人即是固定配對的伏虎、降龍尊者，代表十八羅漢群組。下段集中一批肩披飄帶、手持金剛杵的戴冠武神，造型高度雷同、難以具名，應歸入次級神將。明王、神將和羅漢，多雙手合掌，作禮拜狀。

佔據中軸的人物上身赤裸，肩繞長綾，右手執長鎗，雙腳各踏一個圓輪，正面朝向觀者（圖23）。依據法器組合，其身份當是哪吒（梵：Nalakūbara，漢譯「那羅鳩婆」等），在佛教中為毘沙門天的第三子，在清宮卻頗為罕見。㉖哪吒在明清民間信仰逾越出佛教領域，其形象基本沿襲明代小說《封神演義》中的形貌：頭戴乾坤圈，臂繞混天綾，腳踏風火輪，手持火尖鎗。㉗

（三）構圖佈局之風格

兩種神像匣的形制及設計理念高度一致，空間狹小的器表雕刻眾多神仙人物，五官、服飾及持物細節纖毫畢現，造型姿態無一相同，展現出非凡雕工。構圖方面，畫工利用丹陛和宮苑欄杆分割出不同空間單元，人物呈現中軸對稱

永登感恩寺金剛殿栱眼壁畫圖像考釋——兼論其空間佈置及十忿怒尊與十大明王的區別〉，收入何星亮、廖暘編，《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252-295。

㉖ 早期經典研究，參見柳存仁，〈毘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收入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中，頁1045-1094。有關哪吒的早期印度教淵源，及隨佛教傳入中土直至明清的形象嬗變之研究，參見Meir Shahar, *Oedipal God: The Chinese Nezha and His Indian Origi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㉗（明）許仲琳撰，《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明萬曆間金閶載陽舒文淵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分佈，可追溯至中古時期的經變壁畫。如敦煌莫高窟初唐的220窟南壁和329窟北壁（圖24），㉘ 前者反映阿彌陀淨土變，後者則描繪彌勒經變，以西方淨土佛國建構敘事場景：主尊居於圖像中心，兩脅分佈菩薩等眾；空間格局模仿宮苑建築，欄杆和臺閣以一定透視比例劃分出神聖場域，引發禮拜者的視覺共鳴。人物呈中軸對稱式分佈，是唐宋以降的佛教木刻扉畫盛行的構圖手法，亦見於《乾隆大藏經》的多部佛典的經首扉畫（圖25）。雕漆神像吸收至尊神居中，從神環繞四周的說法圖式，與乾隆《萬法歸一圖》（圖26，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運用透視手法突出視覺焦點的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㉙ 畫幅描繪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爾扈特部東歸，在剛竣工的熱河普陀宗承之廟舉行法會慶典的一系列事件。㉚ 全圖以平行散點透視的俯瞰視角切入，普陀宗承之廟的萬法歸一殿內供釋迦牟尼的佛龕及前方空地的供壇為中心，次要人物以平行隊列，分佈中軸線兩側。

另一方面，諸神列隊朝謁主尊，呈側面七分像，地位從中心（主尊）向外逐步遞減的構圖，秩序感遠比丁觀鵬（約1708－1771後）繪製的《西方極樂世界》、《說法圖》等佛畫鉅構更強烈。㉛ 筆者認為此特徵屬於道教朝元圖所代表的視覺元素。以山西芮城永樂宮的元代壁畫朝元圖為例，朝覲神仙劃分為東西墻壁的兩個群組，從左右兩側向北方，即中間的三清主神作朝覲（圖27）。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指出，道教的朝元圖模仿了傳統的宮廷朝覲儀式，不過在此其統治者位於天宮，而非宮廷。㉜ 龍紋丹陛體現出的帝王規格，表明神仙世界也有一套與宮廷類似的君臣關係的等級秩序。雷部元帥、四值功

㉘ 段文傑、樊錦詩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5・敦煌初唐》（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2006），頁33，圖34；頁76-77，圖89-90。

㉙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圖141。

㉚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文物》，1996年第10期，頁86-92；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pp. 14-17.

㉛ 有關丁觀鵬的佛畫，尤其是德國柏林藏《說法圖》的圖像分析，見Ching-ling Wang, *Praying for Myriad Virtues: On Ding Guanpeng's The Buddha Preaching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Dortmund: Verlag Kettler, 2017).

㉜ Lennert Gesterkamp, *The Heavenly Court: Daoist Temple Paintings in China, 1200-14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曹和判官等地祇向主尊朝拜，也見於前舉之《諸神朝元圖》（圖13）。由此觀之，雕漆神像不僅吸收佛教常見的說法圖式，也融攝了道教朝元圖的視覺傳統。

佛、道兩教神譜共同採用這一種混合式構圖，眾多神祇的形貌與服飾也具有濃郁的漢式風格。三世佛皆吸收明清時期漢地流行的圓臉、凸肚的造像特徵，而彌勒佛更吸收了民間布袋和尚的形貌。八大菩薩統一呈女相，就穿著服飾而言，對襟寬袍有融攝漢地俗裝的成分。十大明王則承襲漢地水陸畫的圖像傳統，採孔武有力的金剛力士造型，同見於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的南宋塑像（圖28）。[33] 諸多神祇與乾隆朝《佛像量度經》和《三百佛像集》中的同類藏式尊像（圖29）相去甚遠，亦與內府積極引入尼泊爾造像的梵式風格，大異其趣。這批經匣的圖像及設計主旨是什麼呢？以下將藉助檔案重組情境，對上述議題深入分析。

二、雕漆神像之樣式：漢式設計與品質管控

兩組神像經匣的成造脈絡，始見於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十五日《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活計檔》）〈匣作〉：

> 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合牌匣龕樣一件、紅雕漆匣一件。傳旨：將合牌龕上照雕漆匣上玉皇、神將畫樣一張，其玉皇大帝要分中，將諸天神將並從神，俱要畫全。邊上畫龍，背後畫二龍捧簽子，簽上著張若靄寫「大清乾隆年敬製」。再將佛像、菩薩並從神，亦畫樣一張，將諸神菩薩、神將謁諦、羅漢並從神，亦俱要畫全。邊牆上仍畫龍，背後亦畫二龍捧簽子，簽上著張若靄寫「大清乾隆年敬製」。其龕座上應畫何樣畫何樣，先畫樣呈覽，准時交安寧、圖拉用五彩漆雕做。欽此。[34]

---

[33] 大足寶頂山的十大明王半身塑像是極少數的早期存例，見鄧之金編，《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寶頂山石窟》（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下，頁5-17。八大忿怒金剛集中出現於乾隆六品佛樓之第二品「無上陽體根本品」，作為守護曼荼羅壇城的護法神，其藏式儀軌與神像匣圖像有較大差異。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1冊，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匣作〉，頁6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五日後，即十二月初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裝經匣龕雕漆玉皇大帝、諸神、護法紙樣一張」呈進。乾隆帝要求照樣准做，指示「俱照玉皇層地杖畫樣雕做黃的，其餘諸樣雕刻處俱用紅漆雕做。」㉟ 二十日，太監將內府畫得經匣樣一張呈進。皇帝針對圖樣提出修改意見：「將裡口高放二分，寬放二分，薄厚照樣准做，黃漆地紋紅漆做。」八天之後，即十二月二十八日，玉皇大帝經匣樣一件及諸佛菩薩經匣樣一件，照樣准做。翌年（乾隆九年，1744）五月二十六日，兩件經匣即告完成，送京呈進。㊱

內府以雕漆匣的「玉皇、神將」圖像為原型，起稿道教神像一張，輔以合牌匣龕樣。「龕」名暗示立式匣樣或仿自宮中神龕，至少肯定此特殊器形是皇帝授意為之。乾隆帝將兩大宗教神譜平行，強調道教和佛教神祇各自「俱要畫全」。神祇名號及數量雖各有差異，仍套用統一構圖，起稿當是出自同批畫畫人之手。相對於一般經匣，皇帝對兩種神像匣龕，從圖樣、款識到尺寸，甚為重視細節。

乾隆皇帝訂製雕漆經匣不乏先例，蘇州織造曾經在乾隆七年十二月呈交一批雕漆活計，當中包括一些經匣，品質被他評為「中等」。㊲ 此外，比兩種神像匣龕活計稍早的乾隆八年六月，皇帝傳旨為新製三般若經的經頭、尾板配做插畫，強調「佛前捧供現之人不必畫，再經上喇嘛字著喇嘛認看。」㊳ 可知該佛經是由藏文（喇嘛字）書寫。再指示為它配一件檀香木箱，外套雕漆匣，匣蓋上兩邊雕做二龍中間安一橫簽，周圍畫龍，先畫樣呈核，再交南邊漆做。㊴

㉟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匣作〉，頁647。

㊱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頁647-648。

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記事錄〉，頁539。

㊳ 乾隆在此強調了藏文佛經的裝潢、插畫，應按照相應藏式儀軌。除著喇嘛認看經上的喇嘛字（藏文），隨後更命「此經喇嘛寫，佛像亦著喇嘛畫。如喇嘛不會畫，另著人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乾隆八年五月十四日，〈匣作〉，頁610。

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匣作〉，頁610-6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九年（1744）正月十八日，皇帝傳旨蘇州織造「照先傳做佛教匣龕樣式」，再做一件雕漆匣龕：

> 著安寧、圖拉照先傳做佛教匣龕樣式，再做上等雕漆匣龕一件，高九寸五分，寬四寸八分，裡口入深八分。此匣龕只做一件，先傳做。玉皇大帝並諸佛菩薩匣龕趕年不要，亦不拘數目，陸續帶做得時送來。㊵

此旨意「照先傳做佛教匣龕樣式」，並非指皇帝最早針對道教神像而依樣另畫的「諸佛菩薩經匣樣」。檢視同期檔案，約一個月前，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交出一件原裝雙身佛匣子做木樣，他要求「交與安寧、圖拉照樣做雕漆匣，其花樣要與經匣上花樣一樣雕做。」翌日（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達具體旨意：

> 著匣中間裝佛，兩邊空處裝經，上做金翅鳥，下做須彌異獸座。其匣面上畫佛，匣外背後兩邊並頂俱寫經，匣蓋要又（有）蓋，先畫樣呈覽，准時做雕漆。㊶

經數次來回呈樣和修改，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裝佛像、佛經的匣子龕一件持進呈覽，皇帝再確定「准做上等雕漆，背面刻『乾隆敬製』」。㊷ 日期恰

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2冊，頁381。

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頁828。

㊷ 「于本月十七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雙身佛二尊。傳旨：著將現做樣匣內做重樓龕安供此佛，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于本月二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合牌重龕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做白檀香的。欽此。

于乾隆九年正月初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匣子龕兩邊裝經簾板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此簾板俟尺寸准時交南邊織做。欽此。

于乾隆九年正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經簾五件。傳旨：照此經簾花樣顏色，交安寧、圖拉織做緙絲經簾四份，每份計五張。經頭佛添蓮花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與前述「再做上等雕漆匣龕一件」之旨意相重疊，可見是基於裝雙身佛匣龕的新旨意。

剔紅匣龕的神像圖樣，成為多件雕漆匣的範式。皇帝在八年十一月確立了玉皇大帝、諸佛菩薩為主尊的神像圖式。十二月，為裝佛像、佛經做一件「上等雕漆」匣龕，他囑咐「其花樣要與經匣上花樣一樣雕做」。內文具體花樣所指：「上做金翅鳥，下做須彌異獸座，並畫佛的造型」，與實物相吻合（圖20）。次年（1744）正月，安排蘇州再做一件「上等雕漆」匣龕，匣面沿用佛教神像，且趕在「玉皇大帝並諸佛菩薩匣龕」前，優先傳做。皇帝兩次指示蘇州織造做「上等雕漆」，做工要求比先前評為「中等」的經匣有所提高，表明神像匣龕受到更高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為保障另外三件同時期置辦的雕漆經箱的做工品質，蘇州動用了內務府造辦處貯藏的物料：

> 做雕漆經箱三件，用造辦處高麗夏布四百三十九丈二尺等語。啟怡親王：准行。遵此。回明內大臣海望、侍讀學士沈、給事中傅、郎中色、員外郎李、司庫白世秀：准行。㊸

經怡親王弘曉（1722－1778）等內務府大臣審核放行，蘇州織造調用內庫質量上乘的高麗夏布共四百三十九丈，平均每件經箱布漆約用一百四十五丈。先用

並須彌座，經尾護法添纛絲須彌座。經板照此花樣寫字，做綠地紅漆地，畫金花、寫金字，做金綿楠木胎。俟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

于乾隆九年正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合牌經頭、經尾板二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此畫像不好，隨我們這裡畫法，著盧鑑畫，用須彌蓮瓣鑲珠石纛絲歡門。欽此。

于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匣子龕佛像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做上等雕漆，背面刻「乾隆敬製」。欽此。

于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經板佛頭、佛尾二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蘇州〉，頁828-829。

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3冊，乾隆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蘇州〉，頁7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灰漆、麻布做過地杖」，堆用紅漆百道，再雕做花紋，工序繁複。㊹ 以上檔案描述，為雕漆神像匣達至「上等」品質所要求的漆作工藝提供一定參考。

基於現存實物和檔案記錄，始自乾隆八年，雕漆媒材與諸佛神像形成了固定組合。除乾隆九年前後密集成造的神像匣龕外，同年八月十七日，乾隆皇帝打算為一套重要的五色佛數珠配匣，指明使用雕漆櫃，並且畫諸佛神像。㊺ 賴依縵結合《活計檔》和清宮黃籤，從臺北故宮的藏品實物中找到與數珠箱同時訂製的一套五色救度佛母和五方佛。她進而推演出成做數珠箱之歷史背景，可能與乾隆九年至十一年皇帝一連串大興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舉措有關，主要包括改造雍和宮和乾隆十年接受章嘉國師的灌頂儀軌。㊻ 數珠箱由原本預定以雕漆畫諸佛神像，後又改以戧金畫八寶，轉至京城完成，最後以最簡省的五彩塗漆完成，應受完工期限的掣肘。乾隆曾要求「將數珠箱趕年底要得」，而工匠雖趕在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將裝配完備的成品持進，隨後因質量粗率，交回返工。㊼ 雕漆媒材配合諸神佛像，原是乾隆認定的理想方案。

乾隆八年至十一年，一批重要匣龕採用剔紅神像作為匣面裝飾，足見此樣式的特殊性。御書楞嚴經匣的置辦旨意，見於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初六日〈蘇州〉，乾隆皇帝交出「御筆藏經紙《楞嚴經》二套」，傳旨造辦處「照雕漆佛經匣樣式、花紋配匣盛裝，先做樣呈覽，准時交南邊做雕漆。」至十九日：

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硃批奏摺，江蘇巡撫安寧〈奏為奉辦大紅雕漆經箱明年三月告竣送京事〉，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檔號：04-01-14-0015-042。

㊺「要五色念佛素（數）珠俟候呈覽。欽此。……再數珠帶子上要繞色做法，裝念珠數珠著做雕漆櫃一對，每櫃內裝數珠五盤，其櫃上週圍畫諸佛神像，先畫樣呈覽，准時交南邊雕做。欽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3冊，〈玉作〉，頁53。

㊻ 賴依縵，〈各族巧匠工藝結晶：乾隆九年至十一年製五方佛與救度佛母數珠箱〉，《九州學林》，35期（2015），頁75-110。

㊼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3冊，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頁55：「司庫白世秀將做得裝五色數珠箱二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裝數珠五色救度佛母，其箱上各配鎖鑰。欽此。」至於後續質量問題和返工，見賴依縵，〈各族巧匠工藝結晶：乾隆九年至十一年製五方佛與救度佛母數珠箱〉，頁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副催總達子將做得雕漆佛經匣合牌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照樣准做四面佛像，頂子面上要四海龍王捧簽，雲中多配令縱神，下邊要江芽（崖）海水。欽此。于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司庫白世秀將織造圖拉送到雕漆經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㊽

一面佛像俱改成「四面佛像」，「四海龍王捧簽，雲中多配令縱神」的文字記載，與實物相吻合（圖19）。相比起單面神像匣，盛放高宗御書《楞嚴經》的經匣是單獨特製，該經對皇帝的個人意義也值得進一步關注。

乾隆皇帝針對漢文佛典之經頭、經尾插畫，以及相關配套漆盒的圖樣，往往指定漢人畫樣完成。除主導藏傳佛教造像和法器配置的中正殿喇嘛外，如意館亦有漢地畫師參與畫佛。前述之配置雕漆佛龕的雙身佛、佛經，為配合藏式風格，一開始指定喇嘛為護經板繪製佛像，卻遭到皇帝的負面評價：「此畫像不好，隨我們這裡畫法，著盧鑑（鑒）畫，用須彌蓮瓣鑲珠石纛絲歡門。」㊾ 盧鑒是活躍於乾隆早期的如意館畫樣人，漢籍南匠出身。他與姚文瀚（活躍於十八世紀）曾在乾隆七年（1742）交畫稿二張，隨即奉旨「幫助郎世寧畫咸福宮藤蘿架」。㊿ 兩年後，造辦處為成做裝佛經的洋漆屜匣，需畫五供七珍等紋飾，乾隆囑託：「其所畫之畫著造辦處人畫，不必著喇嘛畫。」(51) 兩個案例間接證明，藏傳佛教儀軌的造像、唐卡、擦擦之樣式，乾隆以章嘉呼圖克圖為首的喇嘛的認看意見為依據，而對待藏式造像、佛經的包裝設計，若喇

㊽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4冊，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蘇州〉，頁346-347。

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頁829。

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五月二十五日，〈如意館〉，頁68。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5冊，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匣作〉，頁4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嘛之畫工難達要求，也會給予一定靈活性，由漢人畫師遵照皇帝喜好畫樣，形成漢藏交融的風格。神像經匣內盛的寫經皆以漢字書寫，採用漢地傳統的經摺裝，扉畫均由漢人畫家繪製完成，可見匣面的三世佛、八菩薩、四天王等常見於清宮佛樓之般若品（大乘佛教）的神祇，選擇不同於藏傳儀軌的漢式設計，以期內外風格保持相對統一，應是主要考量。內府交蘇州織造成做緙絲類織繡佛像，同樣是經過畫樣御覽或喇嘛認看之程序。以此作為參考，剔紅經匣的道釋神像的構圖一致，人物開臉風格相同，畫樣乃出自同批漢人畫師之手，最後經皇帝御覽首肯。

如前已述，首批道教、佛教神像經匣各一件，成為經御覽驗收的樣品，為翌年大規模生產埋下伏筆。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州織造圖拉來文，希望皇帝為道經、佛經匣的「數目並雕漆活」定限。乾隆回覆：「道經匣做六件，佛經匣做二十件」。[52] 立式經匣大致分兩批成做，也為前述的私人藏品（附錄2.9）與其他作品的風格差異提供合理解釋：前者很可能就是乾隆八年底最早置辦的一件樣品，其餘則從屬後來同批生產、陸續呈交的二十件佛經匣。紋飾及雕工差異，表明兩批製品應是出自不同工匠之手，蘇州漆工需要嚴格遵照神像設計，其餘次要裝飾則有一定的發揮空間。漢式的神像設計與漢文寫經雖有相互配合之意，為進一步探討兩者關係，仍需重組乾隆皇帝的寫經活動，以及御筆經冊和神像經匣的組合陳設。

三、供經事神：節令抄經與供養祈福

（一）御書道教黃庭經

雕漆神像經匣有別於同類容器的主要特徵，不只是獨特的神譜圖像，更在於宗教供養的重要性。乾隆朝《陳設檔》多年記錄顯示，紫禁城御花園區集中供奉道教神祇的三大宮觀的供壇上（圖30），神像匣盛御書《黃庭經》陳供：

---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2冊，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州〉，頁3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御書《黃庭經》與神像匣的陳設原狀

地點	點查時間	供奉對象	陳設供器
御花園欽安殿	乾隆二十一年㊸	玄天上帝	殿內正龕一座，龕掛綉金龍帳幔，內供玄天上帝一尊，身罩青雲緞八團龍袍，腰繫白玉帶，座前供玄天上帝神牌一面，供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一部（紅雕漆神像匣盛）
御花園斗壇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乾隆二十四年㊹	斗母	紅雕漆神像匣，內盛御筆墨刻太上黃庭經內景外景玉經壹套（貳冊）
天穹寶殿	乾隆四十六年㊺	昊天至尊玉皇上帝	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一部（紅雕漆神像匣盛）

天穹寶殿（供玉皇大帝）、御花園的欽安殿（供玄天上帝）與斗壇（供斗母）的主尊正龕前的神牌首位（圖31），各擺乾隆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一部，用「紅雕漆神像匣」盛。晚訖民國故宮物品點查之時，該陳設佈置一直維持不變（圖32）。㊻

筆者寓目的天穹寶殿陳設的御書《黃庭經》是經摺裝，每半開7行，行15字，版框23.3×12.7公分。內景、外景玉經分兩冊合裝於仿宋錦函套內。經書正文前有明黃蠟箋泥金彩繪雲龍紋護頁，扉頁繪靈寶天尊像，卷末繪王靈官護法神像（圖33，附錄1.1）。無序跋；《黃庭內景經》卷端題「太上黃庭內景

㊸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6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727、762、814。

㊹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6冊，頁624、646。

㊺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0冊，頁244、270。

㊻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編第五冊（北京：故宮博物院發行，1925），卷5，頁106；第二編第六冊，卷2，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玉經」，內分三十六章，末書「乾隆九年歲在甲子暮春之初九洲清晏御筆」。《黃庭外景經》卷端書「太上黃庭外景經」，末書「乾隆九年甲子春正敬書」；兩冊末尾鈐有「乾隆宸翰」和「惟精惟壹」兩璽，與《秘殿珠林初編》記錄勘合。[57]

皇帝在乾隆九年春令，分兩次抄寫黃庭經，次年正月用神像匣供。《陳設檔》記錄，乾隆十年正月初九日，皇帝命人將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二冊一套，陳供天穹寶殿內（圖34），[58] 時序迎合祭祀活動。每歲正月初九，適逢玉皇大帝的誕辰，[59] 內府在天穹寶殿會為昊天玉皇上帝舉辦「天誕道場」。每年元旦，皇帝至欽安殿拈香行禮；每遇年節，欽安殿內設道場，道官設醮進表，[60] 故有理由相信供奉欽安殿及斗壇的《黃庭經》，亦配合相應儀式來安置。

《黃庭經》分《外景玉經》與《內景玉經》二種，其先後與本末尚存疑，成書不晚於四世紀。[61] 通篇皆以七言韻語描述人體內象（上頭部、中心宮、

---

[57] 王子林，《紫禁城原狀與原創》，上冊，頁145-147；（清）張照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初編》，卷1，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冊1，頁46a。

[58] 同年五月，再傳旨為經刻套做殼面。兩年後（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初，同套《黃庭經》「並殼面四塊套一件，著安殼面入套盛裝，仍供原處。」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0冊，頁200、244。

[59] 北宋徽宗皇帝（趙佶，1082－1135）在位時期，道教信仰的玉皇大帝神格首次引入國家祀典，正月祭祀「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在神位上有融合之勢。吳錚強、杜正貞，〈北宋南郊神位變革與玉皇祀典的構建〉，《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頁47-58。《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分三卷五品，上卷〈清微天宮神通品〉講述解元始天尊在法會中講述玉皇歷經多劫得道的過程，後者在凡間即是誕於丙午年正月九日。清代內府刊刻的道教典籍門類及數量遠不及佛教，其中《玉皇經》屬最重要者，順治、康熙、乾隆年間皆重印，並附有精美經首扉畫。翁連溪，《清代內府刻書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上冊，頁166-167。

[60]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6，頁111。

[61] 學界對《內景經》和《外景經》的先後次序尚存爭議，仍普遍認為其成書不晚於魏晉之際。王明，〈《黃庭經》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頁539-574，後收入氏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324-371。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將《內景經》繫於東晉，並主張它與上清天啟活動有密切關聯；而《外景經》即原本《黃庭經》，在公元255年以前成書，見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s,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五臟）全身八景諸神、二十四真的形象與作用，旨在煉炁存神，達至養生修身之效。唐宋以降，《黃庭經》作為詳述長生修真之道的經典被內丹道推崇。道教抄經用以誦經修習、積功求福，與佛教傳統殊途同歸，為清帝沿襲。乾隆皇帝在正月、三月先後抄寫《外景經》和《內景經》，實有依據可循。一年之正月，乃屬冬去春來、陽氣漸增，萬物滋長之時節，呼應《黃庭經》存思人體內象，順應外象（日月、星辰、雲霞自然之象）的要旨。其次，晉人王羲之（約303－361）據信最早臨寫《黃庭經》，繫其名下之搨本歷經多代書家摹寫和傳搨，已成垂範書史的小楷名篇。[62]《陳設檔》記重華宮恭藏高宗御臨王羲之《黃庭內景經》掛軸一幅。[63]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御臨《黃庭經》一冊裱做手卷，交蘇州配製彆子、錦袱。[64] 官方史料顯示，元人趙孟頫（1254－1322）是高宗御臨《黃庭經》的重點對象。[65]《黃庭經》養生延壽之功效受到推崇外，其在書史的典範地位，亦是乾隆看重該道經的原因之一。

Daozang,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96-97. 此論首先見施舟人早期著述，Kristofer Schipper, *Concordance du Houang-t'ing King: Nei-king et Wai-king*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5), p. 8: "Introduction". 另參見Paul W. Kroll, "Body Gods and Inner Vis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55; 虞萬里，〈《黃庭經》新證〉，收入氏著，《榆枋齋學術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513-550。

[62] 中田勇次郎，〈黃庭経諸本鑑賞記〉，收入氏著，《中國書論集》（東京：二玄社，1980），頁83-136；中田勇次郎，《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東京：二玄社，1960）。有關王羲之個人生平以及他與道教關係的討論，參見祁小春，〈王羲之與道教的關聯〉，收入氏著，《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506-584。

[63]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5冊，頁200、444。

[6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35冊，十二月初十日，〈行文〉，頁491-492。

[65] 例如，乾清宮貯有「御臨趙孟頫黃庭經外景經并繪老子像一卷」、「御臨趙孟頫《黃庭經》墨搨五十卷」。（清）張照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初編》，卷1，頁46a；卷16，頁173-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御書佛經

神像匣盛放御書佛經，同樣在紫禁城內多間佛堂供奉。《陳設檔》所載地點及陳設原狀（圖30），輯錄如下：

表2、御書佛經與神像匣的陳設原狀

地點	點查時間	供奉對象	陳設供器
建福宮花園，慧曜樓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66]	不詳	不詳
中正殿區，寶華殿	宣統二年（1910）[67]	番銅釋迦牟尼佛一尊	御書《智嚴經》一部，藍紙泥金字，雕漆匣內盛
寧壽宮花園，抑齋樓上佛堂	道光年鈔本[68]	不詳	（四十六號）紅雕漆蓋匣壹件，內盛御製《楞嚴經》貳套（圖35）
			（四十七號）紅雕漆罩蓋匣貳件，內盛御書《瑜伽大教王經》陸冊

慧曜樓是紫禁城內的首座六品佛樓，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建。《活計檔》顯示皇帝在此數年間，為其內部佈置和陳設煞費思量。乾隆二十四年（1759）圍繞慧曜樓裝潢而展開的活計達至一個高峰。同年六月，紅雕漆經匣內盛佛經一部呈進，乾隆皇帝囑託造辦處為之配靶皮畫金罩蓋匣、香几各一，趕在年底

[6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4冊，頁151。

[67]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30冊，頁164。

[68]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27冊，頁5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成，呈進安供。[69] 雖難以追查每部御書佛經裝匣安供的確切日期，檢索乾隆朝設立的佛堂陳設檔案，佛經交中正殿神臺的時間，除集中在正月外，少數在六月。[70]《秘殿珠林》集中收錄乾隆帝的佛、道經宸翰尾跋，表明十二月、四月浴佛節、六月是一年較集中的寫經時間。[71] 另外，皇帝多次指明或暗示帶神像的經匣需趕年底要得，[72] 配合佛經安供，同樣順應節令的週期性規律。

寧壽宮佛樓在晚清查得「《楞嚴經》貳套」，即是北京故宮乾隆十一年高宗寫本，半開5行，行11字，版框14.4×9公分（圖36，附錄2.6）。十冊分二函合裝在黃色地團龍朵花萬壽紋織金天華錦函內。經首、經尾描金八寶，經首扉畫彩繪釋迦牟尼、佛弟子、神將等眾。承前已述，《楞嚴經》對乾隆帝別具意義，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Śūraṅgama Sūtra*），自唐代譯出漢文，北宋以降各大藏經均有收錄，包括《乾隆大藏經》。全經十卷分三部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講述佛遣文殊師利以神咒保護阿難免受摩登伽女破戒，並告阿難及一切眾生，生死輪迴皆因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73] 漢譯本之卷七神咒，因與藏地所傳諸《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內容多有雷同，同俱印度佛教淵源而引起乾隆皇帝關注。[74] 乾隆十年，皇帝曾為

---

[69]「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紅雕漆罩蓋匣一件（內盛經）。傳旨：著配靶皮畫金罩蓋匣盛裝，配香几，得時在慧曜樓供。欽此。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紅雕漆罩蓋匣一件（內盛經）配得鞔皮畫金罩蓋匣、香几，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4冊，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油木作〉，頁151。

[70] 以中正殿為例，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多次在神臺上供經陳設，其中9次為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3次在六月。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31冊，頁467-471。

[71]（清）王傑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內府鈔本影印，1988），第3冊，〈乾清宮藏〉，頁25-49。

[7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2冊，頁381。

[73]（唐・天竺）般剌密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收入雍正敕修《乾隆大藏經》（北京：中國書店，2010），第26冊。

[74] 孔令偉，〈《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收入沈衛榮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頁640-6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咒梵音翻譯和考校一事諮詢章嘉國師，藉此重新修訂，應是促成一年後他抄寫該經的契機。[75] 同年四月由武英殿新刊刻的《楞嚴法懺》共十部一包，即屬此次校訂成果，很可能是皇帝用於翌年臨抄的範本。[76] 乾隆十七年（1752），他令莊親王（1695－1767）及章嘉國師等人，將《楞嚴經》依其序譯成滿、蒙、藏諸文，以四體合璧本刊出。乾隆在序中提及此經「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77]

乾隆皇帝抄寫經書的時序規律透露出更多訊息。他在乾隆十一年、十九年（甲戌，1754）兩度抄寫《楞嚴經》，依照十冊宸翰末款，過程歷時約四個月：

> 第一冊，四十七葉，末款：乾隆甲戌四月廿七日書起，至閏四月初三日書竟；第二冊，六十葉，末款：浴佛日書起，至是月望日書竟；第三冊，六十三葉，末款：四月望日書起，至五月朔日書竟；第四冊，六十二葉，末款：五月朔日書起，至是月望日書竟；第五冊，五十三葉，末款：五月望日書起，至六月朔日書竟；第六冊，六十六葉，末款：六月朔日書起，至是月望日書竟；第七冊，七十六葉，末款：六月望日書起，至七月朔日書竟；[78] 第八冊，五十八葉，末款：七月朔日書起，至中元日書竟；第九冊，六十九葉，末款：中元日書起，至八月朔日書竟；第十冊，四十八葉，末款：八月朔日書起，至是月上弦日書竟。[79]

---

[75] 《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乾清宮〉收乾隆十八年御書《楞嚴經》十冊之識語：「卷中神呪，刻本音字率多訛舛。蓋華音梵唄，隔越川嶽，非唇齒喉舌所能同耳。譯釋既誤，魚魯因生，致誦習相沿，莫能究證。乾隆十年重定楞嚴法懺時，咨之普善廣慈大國師章嘉喇嘛，細加校勘。用切音法，悉依西梵正傳，舌上蓮華，頻爾重開真面目也。頻香山畫禪室乾隆敬識。」（清）王傑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頁27b-28a。

[76] 「乾隆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奏，奉旨：武英殿如有新刻書籍著伊帶去，不可重複。欽此。《御製圓明園詩》十部一包，內五包，每包二部，每部二本；《楞嚴懺》十部一包，內五包，每包二部，每部一冊。」收入翁連溪編，《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上冊，頁111。

[77] （清）高宗弘曆，《御製文初集》，第1301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2，〈翻譯四體楞嚴經序〉，頁116b-117a。

[78] 此有乾隆抄經附註的識語，為行文之便在此省略，另見前註75。

[79] （清）王傑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頁27b-28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始於暮春四月的浴佛節前夕，訖至八月上弦日，離其壽辰（八月十三日）不久，時序上連結佛陀（神性）與皇帝本人（皇權）。乾隆藉助抄寫《楞嚴經》，修養心性，亦具祈福延壽之意。乾隆三十六年（1771）御製楷書泥金《楞嚴經》漢文寫本中經首的牌記：「佛頂楞嚴，是最尊勝。……悉仗願力，福德長壽」，[80] 凸顯他推崇該經之目的。

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在八月初六日交出此經，證明他兩次抄寫《楞嚴經》的時序保持一致，已成慣例。九月二十九日，這套新的御書《楞嚴經》，照雕漆匣內舊楞嚴經「畫三色泥金八吉祥五分」，並為經頭、經尾彩繪插畫（圖36）：

> 副催領六十一持來員外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為七月十九日，報上帶來《楞嚴經》一部十冊，太監胡世傑傳旨：著姚文瀚照雕漆匣內舊《楞嚴經》畫三色泥金八吉祥五分，經頭尾板亦照舊樣著色畫一分，得時交薩木哈裱。欽此。[81]

「雕漆匣內舊《楞嚴經》」，即是指乾隆十一年置辦多面神像罩蓋匣，裝御書《楞嚴經》一事。1776年寧壽宮重建竣工之後，皇帝很可能將舊《楞嚴經》連同雕漆匣轉移至抑齋二樓佛堂。作為乾隆皇帝原計劃在御臨六十年後歸政息養之所，寧壽宮象徵皇帝晚年追求福壽的願景，與《楞嚴經》相得益彰。

乾隆帝抄寫《楞嚴經》依每月之朔、望而行的時間規律，有先例可循。抄寫佛經被認為是一種功德而成為清帝之必修，多依天象運行及家國吉慶，或面對重大變故事件時，企望藉助抄造佛經，獲得心靈慰藉，進而消災解厄、積聚福德。[82]《秘殿珠林》著錄康雍乾三帝之御書佛經，蔚為大觀，足見深受抄經

---

[80] 向斯，《中國宮廷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239。

[8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0冊，乾隆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如意館〉，頁382。

[82] 清帝抄經通常選擇佛典中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等為主要內容的典籍，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大乘佛教所尊奉的經典。其中乾隆十三年六月御書《佛說賢首經》（附錄2.7）緣起應是孝賢皇后（1712－1748）同年三月東巡途中薨逝，皇帝以此寄託哀思並祭奠亡妻。奚可禎，〈南京博物院藏乾隆皇帝御書《佛說賢首經》〉，《文物》，2016年第2期，頁9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祈福的漢地約俗的影響。彭悅柔藉助檔案文獻，總結出聖祖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在位）抄寫佛經的習慣轉趨日常化，抄寫經書的時間分成四類：其一是每月朔望日，其二是宗教紀念日浴佛節，其三是帝后誕辰日，其四是零星的隨機性抄寫。[83] 康熙皇帝之寫經習慣，後為乾隆效仿。祖孫二人對心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 Sūtra*）著力頗深。乾隆從即位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每年元旦和四月初八浴佛節，毫無例外抄寫《心經》一部。乾隆四十年以後，仿效康熙定例於每月朔、望二日都要再寫一回，《活計檔》稱之為「年例《心經》」。《養吉齋叢錄》云：「高宗每歲元旦，必書《心經》一冊，至每月朔望書《心經》，則自乙未年始，用聖祖成例也。」[84]

此外，康熙、乾隆年間，不乏臣工抄寫佛經，以祝賀聖壽名義進呈。其中張若靄（1713－1746）最受矚目。他的父親張廷玉（1672－1755）乃三朝功臣，父子二人皆擅寫經。張廷玉為恭祝康熙帝五十五歲聖壽無疆，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初一日，用墨箋紙配泥金蘸料，齋沐敬寫《金剛經》一冊敬呈，後來藏貯在乾清宮。[85] 乾隆皇帝即位後非常鍾愛張若靄的字畫，常命他為書畫題辭、鑑定。《秘殿珠林》收錄張若靄書宣紙本楷書《佛說無量壽經》摺裝二冊，落款中有「奉敕敬書」四字。[86] 出於對臣工寫經書法的信任，皇帝命張若靄為神像經匣敬書「大清乾隆年敬製」字樣，以示莊嚴。

綜上所述，道經匣專門盛乾隆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供奉於御花園的道教宮觀。較之其他同類經匣，盛御書《楞嚴經》的罩蓋匣相對特殊。對照實物與檔案，經書的安供地點散佈在紫禁城的多處宗教場域，聯繫乾隆強調佛道二教的神像「俱要畫全」的旨意，其出發點是更有效地配合內府多元的宗教環境和供奉對象，以彰虔敬恭誠，增添祈禱效力。該批剔紅神像經匣，應視作乾隆帝按歲時節令寫經和內府事神禮佛的產物。

---

[83] 彭悅柔，〈從檔案論盛清君臣抄寫佛經的特色並淺釋文化意義〉，《史學彙刊》，第29期（2012.6），頁140-154。

[84]（清）吳振域撰，《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3，頁177。

[85]（清）張照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初編》，卷22，頁217a。

[86]（清）王傑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乾清宮藏七〉，頁336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萬神庇佑：神像經匣在清宮的聖物象徵

乾隆皇帝供奉天穹寶殿的玉皇大帝，是敬製道教神像匣的契機。乾隆八年底已確定道經匣樣，九年初先後抄寫黃庭內景、外景經，最終在十年正月完成供奉。從時序來看，打破我們預設先有盛放物、再成做匣盒的思維定式，反而是設計經匣在先，再配合匣樣，統一確定御書《黃庭經》版式及裝潢，佛經匣亦是同理。

寫經之裝潢、盛放方式與神像經匣相配合。立式匣呈扁狹長方體，安供時立於一須彌木座上，有利吸引觀者。單面神像為屜板，將其拉開後，摺裝經冊豎立擺放，封面經名與「大清乾隆年敬製」保持相同方向（圖4a、18b）。進深不足9公分的厚度限定一至二冊，《黃庭經》、《佛說賢首經》、《智嚴經》（圖37）皆屬此例。如附錄三所示，一套六冊的《瑜伽大教王經》實際上未使用神像匣，而是另外訂製一件雲龍紋罩蓋匣，分二匣盛放，每匣三冊（圖38）。反觀為多達十冊的《楞嚴經》獨立設計的經匣，多面沿用佛教神像；天蓋地式造型呈立方體（圖36），兩組經書相鄰橫置，帶經名的封面朝上，故「乾隆御書楞嚴經」款設在匣頂。無論是單面或多面設計，經書暴露在外的匣面皆安排神像，可見圖像被賦予了庇護作用。

道經匣專門裝《黃庭經》一種，神像與文本之間是否存在聯繫？皇帝抄寫該經亦是在心中默念冥想的過程。[87] 基於他多年臨抄《黃庭經》的經驗，對文本已聊熟於心。內景、外景經的篇首皆云：「太上大道玉晨君作七言」，[88] 借靈寶天尊之口，言授存思身形及諸神之道。乾隆九年御書《黃庭經》的經首扉畫直觀地再現經文的開篇場景，正中央繪有靈寶天尊，左手持如意，上有華

---

[87] 與常用於持誦的道教科儀用經有所區別，就功能和韻腳而言，《黃庭經》的口訣偏向供個人唸誦冥想之用。Paul W. Kroll, “Body Gods and Inner Vis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 p. 150;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The Book of the Yellow Court: A Lost Song Commentary of the 12th Century,” *Cahiers d’Extrême Asie*, vol. 14 (2004), pp. 193-194.

[88] （晉）不著撰者，《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908c；《太上黃庭外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卷上，91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蓋，放射瑞光，經尾繪王靈官像（圖33）。[89]

但匣面神像與經文無直接關聯。諭旨最初讓蘇州「五彩漆雕做」神像，後做修改，要求「俱照玉皇層地杖畫樣雕做黃的，其餘諸樣雕刻處俱用紅漆雕做」，重申「黃漆地紋紅漆做」。[90] 筆者認為，乾隆帝似乎是希望通過漆色將「黃庭」具象化（visualization）。唐人梁丘子（生卒年不詳）解釋《黃庭經》經名，有云：

> 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即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內者，心也。景者，象也。外象諭即日月、星辰、雲霞之象；內象諭即血肉、筋骨、藏府之象也。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象色，故曰內景也。[91]

經文傳授存思身內諸神的口訣，讓修行者根據對人體不同器官部位的具體描述，將無形之神具象化。「內景」和「外景」之劃分，體現了道教強調人體內部的微觀宇宙（microcosm）與外部自然的宏觀宇宙（macrocosm）的二元體系。腹部五臟（心、肝、脾、肺、腎）以脾為主宮，對應五行（火、木、土、金、水）之「土」，五色（赤、綠、黃、白、玄）之「黃」。[92]

以乾隆有限的道教知識，未必能深刻理解經文要義，更可能停留在望文生義的階段。經冊內外裝潢統一為黃色地，進一步證明「黃庭」經名對設計產生的影響。除指定黃漆錦地外，乾隆九年御書《黃庭經》採用黃色仿宋封套，經冊首尾接明黃蠟箋紙（圖33）。經首明黃箋紙上，泥金繪五條雲海間翻飛的龍，呼應了滿清帝王重視黃色，視之為皇家專屬的尊貴象徵。[93]

---

[89]（清）張照等敕編，《欽定秘殿珠林初編》，卷1，頁46a。

[9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1冊，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匣作〉，頁647。

[91]（唐）梁丘子撰，《修真十書・黃庭內景玉經註》，收入《道藏》，第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844a-b。

[92]（晉）不著撰者，《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頁909b-910a、912a-b。

[93] 八旗之首為黃旗，施靜菲注意到康熙朝畫琺瑯大量流行黃色地，列舉許曉東原引《奏銷檔》有關黃色器具民間不得擅用之諭旨記錄，參見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47-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皇帝抄寫道教《黃庭經》以及多種佛經，指向頤養心性及祈福添壽。神像匣裝盛的佛經，皇帝抄寫時序雖有先後差異，包裝保持相同。函套統一採用團龍與「萬壽」楷字相間的織錦設計（圖36、37、38），直觀地體現該批御書佛經祈求福壽的寓意，與《黃庭經》的裝潢統一色地異曲同工。結合《黃庭經》經匣的設計理念，為塑造靈驗效果，黃漆地紋結合朱漆神像無疑是理想的視覺媒介。剔紅的入漆色料是銀硃，即是高純度硃砂，又稱丹砂，在道教內丹修煉、養生術之地位非凡，常被認為具有延年益壽、上通神界的特殊功效。[94] 黃漆錦地標示出道教「黃庭」的神聖空間，玉皇大帝佔據中心，神將為首的從神則由內向外，呈放射性分佈。[95] 一眾仙聖皆以朱漆陽文浮雕，與中軸黃地相接之處，漆層邊緣鏤空，進而營造出諸神懸浮在半空、乘雲而降的視覺效果（圖4b、18a），平添「萬神方胙壽有餘」的宗教靈驗。[96]

然而，剔紅神像並未依循《黃庭經》特定的文字內容，而是以層級分明的全景式神譜，廣納清宮內府供奉的道教諸神。以玉皇大帝為中心的道教神譜，可以在宮廷找到構成基礎。供玉皇大帝的天穹寶殿在清代作為皇家道場，除正月初九日舉行天誕道場，皇帝壽辰也會在此舉行萬壽平安道場。據《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玉帝是「諸天之主」、「萬天之尊」，乾隆皇帝奉祀玉皇大帝，不僅是沿襲前朝傳統，亦有奉行「敬天」祖訓之意，宣示滿清皇權的正統性。[97]

---

[94] 硃砂是清代內府入藥的主要成分，如端陽節用於祛暑避疫的錠子藥，見關雪玲，〈關於清宮錠子藥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頁74；劉世珣，〈用作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運作脈絡〉，《故宮學術季刊》，37卷1期（2020），頁39-71。乾隆丁酉年詠雕漆御製詩句「色煉丹砂艷，紋成如意連」，可略窺他觀摩剔紅器對朱漆的視覺體驗。（清）高宗弘曆，《御製詩四集》，第1308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2，乾隆四十二年（1777），〈詠宣德雕漆盒〉，頁42b。

[95] 英國 Sir Harry Garner（1891－1977）比較雕漆與雕版工藝的物質性，推斷早期雕漆錦地是引入唐宋佛教木刻版畫的裝飾母題。Harry Garner, “Diaper Backgrounds on Chinese Carved Lacquer,” *Ars Orientalis*, vol. 6 (1966), pp. 165-189.

[96] 該句引自（晉）不著撰者，《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頁912a。

[97] 陳設檔案顯示供玉帝的《黃庭經》為高宗御書本，供玄天上帝和斗母的經書是御筆墨刻本，明示玉帝在道教神系的至尊地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乾隆朝《天穹寶殿陳設檔》，殿內閣上最高層供奉一尊玉帝，金胎且手執玉碧圭。設欄杆與丹陛，次層兩側供從神十四位，銅鍍金胎。最高的第二及三排列有一組神將，包括天蓬、天猷、王靈官等；[98] 其護法神佈置與經匣神像高度一致。道教神將在乾隆朝受重視，體現在內府供奉的眾多道教武神。天穹寶殿的東配殿供有銅鎏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像一尊，其兩脅分列八尊雷部天君像。[99] 主供玄天上帝的欽安殿，明間以真武神像畫為中心，東西次間及東西稍間的北壁上貼有繪十二雷將的壁畫：鄧、辛、張、陶、王、殷、苟、畢、馬、趙、溫、岳，應是乾隆晚期至嘉慶年間補加。[100] 乾隆皇帝最初要求道教神像以玉帝及神將為首，能夠在內府道教祭祀環境找到其依據。

神像之十二辰、四值功曹和二十八宿，主司星宿和地支，連同《黃庭經》供奉御花園斗壇的道教女神，即統率北斗眾星的斗母，透露出皇帝對星象之關注。御花園澄瑞亭自雍正九年（1731）改建為世宗設壇禮斗、請神祛邪之所，壇上供斗母香胎像、畫像以及配套法器。[101] 與先父雍正禮斗治病的宗教訴求不同，乾隆更關注星象占測人事的吉凶福禍。除多首新年御製詩描述北斗星象，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底，欽天監預測正月初一日會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異象，預示來年「海宇晏安，年穀順成」，遂命蘇州宮廷畫師徐揚（約1712－1779）敕製《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圖39，縱48.9公分，橫1342.6公分）。由此推測，匣面刻畫的道教神祇不僅緊密呼應內府供奉玉帝為首的神系，也反映乾隆皇帝對道教傳統的個人興趣。惟將斗母安排在最底層，明顯不符合其北斗眾星之母的重要地位，應與畫畫人不熟悉道教傳統有關。

匣面圖像與經文內容脫節的現象，亦見於盛放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四月御書《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的剔紅匣（圖40，附錄3.1）。該經

---

[98]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0冊，頁224、269。

[99]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10冊，頁230。

[100] 陶金，〈欽安遺珍：欽安殿藏宋徽宗玉簡與十二雷將神像畫〉，《紫禁城》，2015年第5期，頁70-80。

[101] 雍正八年至九年（1730－1731），世宗在紫禁城內外建造多座斗壇。據乾隆朝《御花園斗壇位育齋陳設檔》記載，澄瑞亭斗壇內供「祥雲七豬輦，內供香胎斗母一尊。紫檀木大鼎一座，內供畫像斗母一尊。」王子林，〈雍正帝所建斗壇與燒丹考〉，《故宮學刊》，第12輯（2014年第2期），頁206-2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釋迦牟尼在鹿野苑向諸菩薩天人說法開篇，講述淨土西方三聖中，當阿彌陀佛入滅後，由觀世音菩薩補其位；觀世音菩薩入滅後，則由大勢至菩薩補處成佛；觀世音菩薩以大慈大悲普度眾生，大勢至菩薩則以智慧光普照一切。經匣立面以陽文雕刻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作為其脅侍，分別乘在坐騎獅和象拉曳的寶蓋輅車。匣面圖像雖然能牽強地理解為釋迦牟尼向諸菩薩說法的開篇場景，但相對於經首扉畫描繪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分別向阿彌陀佛跪拜受法與合掌禮佛之場景，顯然沒有對接經文，更可能間接反映出釋迦牟尼、文殊與普賢菩薩在清宮佛教的尊崇地位。

相同原則也適用以釋迦牟尼為中心的佛教神譜。三世佛、八菩薩、十明王，以及天王、羅漢諸天，依據各自在佛教中的果位及重要性，在雕漆神譜佔據不同層級。三世佛是乾隆時期內府最常供奉的主尊，神像匣供《智嚴經》的寶華殿就是主供釋迦牟尼的佛堂。大規模成做神像經匣的同年（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更將皇考雍正帝即位前的府邸雍和宮，改建成為藏傳佛教喇嘛廟，正殿供奉一組縱三世佛：燃燈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102]

八大菩薩與佛的密教組合最早源自印度，沿中亞、西藏諸地，在亞洲流傳演變。[103] 藏地和清內府視之為「八大佛子」。[104] 羅文華指出，清代內府的圖像

---

[102] 乾隆九年起，皇帝對雍和宮的建築改造、經濟開銷、造像等系列工程，參見賴惠敏、張淑雅，〈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故宮學術季刊》，23卷4期（2006年夏），頁131-171。關於雍和宮建築及內置造像的全面研究中，Kevin R. E. Greenwood將雍和宮整體建築視為一套內、外二層曼荼羅構成的儀軌圖式加以解讀，參見其博士論文：Kevin R. E. Greenwood, "Yonghegong: Imperial Universalism and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Beijing's 'Lama Templ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13).

[103] 八大菩薩的經典出處多引自《八大菩薩曼荼羅經》（*Aṣṭamaṇḍalaka*）。按《佛說造像量度經・附續補》的解說，八大菩薩在過去世亦然成佛，只是由於過去的願力感化而現應身菩薩相。早期在印度發現（如Ellora石窟）的結禪定印的毗盧遮那佛與八大菩薩組成曼荼羅圖像，多集中於七至十世紀。大羽惠美，〈中央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八大菩薩と併置される仏と守門神〉，《密教図像》，26卷（2007），頁13-30；Yoritomi Motohiro, "An Iconographic Study on the Eight Bodhisattvas in Tibet," in Tadeusz Skorupski, ed., *Indo-Tibetan Studies: Papers in Honour and Appreciation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s Contribution to Indo-Tibetan Studies*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90), pp. 271-274. 中亞絲綢之路沿線的畫蹟，如敦煌榆林窟25窟以及藏經洞出土絹畫Ch. 0074 (Stein No. 50) 的毗盧遮那（大日如來）與八大菩薩組合，引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中的有關組合雖存差異，八大菩薩在梵華樓的般若品中分成兩組，位列釋迦牟尼佛兩脅，是清宮最普遍的組合形式（圖41）。[105] 此外，八大菩薩也出現在河北遵化的裕陵地宮，即清高宗陵寢的四重共八扇石門上（圖42a-b）。[106]

十大明王是密宗諸佛、菩薩受大日如來之教令，為降伏諸魔而化現的忿怒形相，位居第三層，空間佈局上具護持作用（圖21b）。[107] 雕漆神像中，明王及下層諸天眾（包括四天王和羅漢佛弟子）身後均無背光，直觀地體現其果位與佛、菩薩之間的差異。

四天王為首的護法神，在乾隆八年始建的裕陵地宮中，位於外層的明堂券兩側壁（圖42c-d），突出對該空間的護持，又與四天王在六品佛樓之第一品「般若品」中，置於曼荼羅最外圍的護法作用相互呼應（圖43）。[108]

乾隆帝曾命章嘉國師以唐代禪月大師貫休（832－912）的《十六羅漢像》為模本，以藏地尊名及順序加以校訂（圖44）。[109] 他在不少像贊和詩文，針對

廣泛關注，學者對圖像及佛典依據之間理解差異而產生分歧，僅舉數例：陳粟裕，〈榆林25窟一佛八菩薩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頁56-82；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薩曼荼羅圖像遺補〉，《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頁18-24、126-127；席琳，〈吐蕃禪定印毗盧遮那與八大菩薩組合圖像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6期，頁41-48。

[104] 除《造像量度經》提及「八大菩薩」為「八大適子」，如梵華樓的第一品「般若品」的漢文說語：「第一妙吉祥大寶樓上供奉如是佛說大乘般若經品內一切調御丈夫天人師釋迦牟尼佛及文殊菩薩、金剛菩薩、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除諸障菩薩、虛空藏菩薩、彌勒菩薩、普賢菩薩八大佛子等……」。王家鵬主編，《梵華樓》（北京：故宮出版社，2009），第1卷，頁148。

[105] 謝繼勝主編，謝繼勝、熊文彬、羅文華、廖暘等著，《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下卷，頁756-757。

[106] 徐廣源，《清東陵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89；陳捷、張昕，〈裕陵地宮石刻圖像與梵字的空間構成和場所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頁53-54。

[107] 廖暘，〈甘肅永登感恩寺金剛殿栱眼壁畫圖像考釋——兼論其空間佈置及十忿怒尊與十大明王的區別〉，頁252-295。

[108] 王家鵬主編，《梵華樓》，第1卷；徐廣源，《皇陵舊照裡的清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229。

[109]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pp. 127-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八羅漢群組中較遲出現的伏虎尊者、降龍尊者的梵名翻譯、次序，投以極大關注。⑩ 雕漆神譜突出伏虎、降龍尊者的固定組合，代表十八羅漢群組，除是一種圖像格套，也反映乾隆帝的個人興趣。

雕漆神譜組合廣泛見於皇帝後來設立多座六品佛樓之般若品，包括供奉御書佛經的慧曜樓，以及灌頂前夕內府其他佛堂內部的造像組合及配置。例如，乾隆十年（1745）三月，乾隆帝傳旨〈鍍金作〉為一座西洋琺瑯三節塔配製金銅造像：「塔頂上寶珠去了，成造佛一尊，將二層墊起蓮花托上成造八大菩薩，下層托上成造十八羅漢。……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將釋迦佛、八大菩薩、十八羅漢蠟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佛、菩薩、羅漢俱做金的，著這裡人做。欽此。」⑪

綜上可知，雕漆神像濃縮了清宮供奉佛道二教的神系以及皇帝的宗教認知。畫畫人按照他的旨意「俱要畫全」，應當俱有所本，內府眾多宗教場所以及跨媒介的資料庫（繪畫、扉畫、造像）可為乾隆欽定的「萬神殿」提供豐富的視覺原型。在清宮佛教藝匠及圖像資源相對完備的前提下，畫畫人和乾隆帝對道教的認知程度明顯不及前者，恐怕是一些道教從神混淆不明以及斗母神格遭貶低的主因，折射出道教在清宮廷中遜於佛教的地位。圖像統一的經匣，卻盛放品類不同的佛經，進一步表明圖文之間無對應關係。正是視覺表達獨立於經文之外的神像，賦予該批經匣獨特的象徵意義。下承須彌木座的立式經匣，如其器樣在《活計檔》得名，造型狹長如一座內供「神像」的龕，不應只視為供壇上盛經的一般容器。⑫ 立面帶御製佛像及法器常見的「大清乾隆年敬製

⑩ 何芳，〈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頁45-58；王崇齊，〈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比勘記〉，《故宮學術季刊》，30卷2期（2012年冬），頁257-303。

⑪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3冊，頁479-480。

⑫ 因形制相近，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的神像佛經匣（附錄2.8）被早期學者誤判為盛供乾隆帝祖先神牌（ancestral/spirit tablet）的容器，見R. Soame Jenyns and William Watson, *Chinese Art: The Minor Arts*, vol. II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65), pl. 167, pp. 354-3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款（圖45），明示其特殊的聖物象徵——再現眾神的神聖圖像，也賦予器物自身等同於宗教造像的神聖性。[113]

結論

雍正時期，內府兼容佛道二教，清世宗曾延請道士為他本人禮斗治病。太和殿藻井上雍正朝所安供的五塊符板，羅文華指出從其內容上看，就體現了佛道合一的主旨思想，可能與雍正帝當時健康狀況不良，向佛道尋求治療的歷史背景有關。[114] 清帝國與藏傳佛教的關係錯綜複雜，雖非個人信仰或以教馭政的單一視角所能簡約論之，乾隆早期對藏傳佛教的重視仍不容忽視。他在即位之後，旋即驅逐雍正朝遺留的道士、方士，削弱內府道教勢力，乾隆七至八年開始在紫禁城內外大興佛堂及配置造像和法器，此趨勢至乾隆十年灌頂儀式達至一個高潮。乾隆朝宗教重心轉向佛教在學界顯然有重要的指示性，而道教相關資料之缺失在一定程度也在強化這種印象。此批神像經匣不僅彌補我們對清宮廷道教信仰的認識不足，結合藝術史、宗教史角度去解讀圖像，更反映出道教與佛教視覺文化在清宮的共存與交融。

作為內府宗教供養的產物，乾隆款神像經匣施朱漆黃地，以細膩精巧的蘇州雕工再現道教天宮及佛教諸天的「萬神殿」。乾隆帝重視其神像設計及工藝品質，旨在訴諸圖像的護持效力，突出內盛經書對宗教供養和皇帝本人的意義：成做時間配合他依循節令（新正、浴佛節、萬壽節、朔望）展開的寫經活動，以及內府道教宮觀及佛堂的供奉活動，達至事神禮佛、祈求靈驗之目的。乾隆朝官方宗教活動之重心在於藏傳佛教，道教仍是皇室祭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內府奉祀玉皇大帝（昊天上帝）不僅依循漢地道教及儒家的相關傳統，亦契合滿族的敬天思想。內盛高宗御書《黃庭經》及多種佛典的神像經匣，自

---

[113] 盛御書《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神像匣亦帶此款，但盛御書大瑜伽教王經的雲龍紋匣則無款，可見「大清乾隆年敬製」款與諸佛菩薩圖像之間形成的組合規律，與內盛經書性質無涉。

[114] 羅文華，〈紫禁城太和殿所供符板及其宗教思想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頁6-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早期一直在玄穹寶殿、御花園（欽安殿、斗壇）以及多座佛堂內安供，部分佛經（楞嚴經、瑜伽大教王經）在晚期轉移至寧壽宮佛堂。作為清代皇室的頭位供奉品，其重要性一直延續至清末，除為乾隆本人祈福延壽外，也被賦予護國佑民的作用。

常被視為附屬品的容器，研究價值難免會被盛放物（御筆寫經）的光環所掩蓋，由此不難理解飾有豐富神像的經匣為何乏人問津。然而，在不誇大其重要性之前提下，筆者主張帶強烈視覺象徵的經匣與被封存的經書，二者在製造「聖物」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雕漆神像設計在1743年底由乾隆皇帝主持及裁定，直觀地反映他本人對兩大宗教的宇宙觀認知。需予以強調的是，同年開始修建的陵寢地宮石刻與佛教神像有所呼應，囊括佛陀、八大菩薩、四天王等組合，共同反映出皇帝在早期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態度。若將供奉御書佛經與修建陵寢地宮，納入皇帝在1745年接受灌頂儀式之前，大規模贊助佛教的宏觀規劃之下有序開展的兩項子計劃，更有助我們去理解兩者背後相通的主旨思想。先後有學者論證地宮金券的近似盝頂的造型，連同石刻梵、藏文經咒，將地宮最大的封閉空間，轉化成為一座佛塔；內殮的帝后棺槨，形成了佛塔覆蓋下，舍利函、外槨、內棺對死者多重庇佑的格局。[115] 棺槨一旦瘞埋，將長期在封閉空間內隔絕於世人視線。成為供奉品的御筆寫經亦同理，一旦封存絕不輕易從匣中取出，同樣強調「葬/藏」的觀念。

這種觀念也適用於佛像裝藏（臟），在藏傳佛教中，是指為其胸腔和腹腔裝入各種寶藏、聖物，以象徵尊像的身語意。透過為造像裝藏、開光，賦予尊像生命力與神聖能力，屬清宮內府配合造像的重要儀軌。[116] 乾隆中晚期，剔紅雕漆盛裝舍利、金銀錢八寶、藏紅花眾多聖物，供新造金銅佛像內裝藏，成為

[115] Françoise Wang-Toutain, “Les cercueils du tombeau de l'empereur Qianlong,” *Arts Asiatiques*, vol. 60 (2005), pp. 62-84；王微，〈乾隆裕陵棺槨藏文經咒釋讀〉，《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頁48-65；陳捷、張昕，〈裕陵地宮石刻圖像與梵字的空間構成和場所意義〉，頁43-44。

[116] 謝繼勝主編，謝繼勝、熊文彬、羅文華、廖暘等著，《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下卷，頁828-8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種新式做法。⑰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隨交紅雕漆圓盒一件，內盛舍利。皇帝下旨：「銅罐並鐵錠金罐、雕漆盒俱在新造金釋迦佛內裝藏用」。⑱ 如現藏臺北故宮的一尊原存熱河的乾隆金宗喀巴佛像，像內中空，裝藏包含白珠狀舍利二顆，以黃紙包裹，外書：「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收第穆胡土克圖進舍利二顆」。兩件剔紅荔枝盒（高3.4公分，徑7.1公分），內盛藏紅花、香木段，及金銀扣各四，上飾八寶紋。⑲ 雕漆器盛裝舍利儼然與盛供御書佛經有異曲同工之處，以奢華容器傳達聖物象徵。

另需留意的是，在雕漆神像上，釋迦牟尼佛兩側各有一座藏式佛塔（圖20），也為我們提示了佛陀涅槃與供奉舍利之間的象徵紐帶。佛教舍利主要分兩類：真身舍利（佛陀身骨）與法身舍利（經文）。⑳ 如同內殮乾隆屍身的多重靈柩，在地宮金券下有意識地模擬「真身舍利」，高宗親自書寫的經書與神像經匣共同構成佛教供奉品，亦可理解為「法身舍利」之象徵。由此觀之，盛供御書佛經的神像匣在儀式場景構建的神聖空間內，應視為乾隆帝將皇權與神權相互連結的聖物。剔紅雕漆用於供養寫經、佛像裝藏，塑造聖物，足見這種源自漢地的工藝媒介，儼然在滿清宮廷的多元宗教環境中衍變出新用途。

附記：

本文修訂自筆者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的第六章，尹翠琪教授、許曉東教授在論文撰寫期間提供悉心指導，特此鳴謝。初稿曾於不同的場合口頭

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第43冊，〈金玉作〉，頁721、775、783；第45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鑄爐處〉，頁118。

⑱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第43冊，乾隆四十五年九月，〈金玉作〉，頁720-721。

⑲ 據其背光背後銘文：「乾隆四十六年孟夏月，衛藏貢有大利益金宗喀巴佛像，奉旨照式范金，造此宗喀巴佛，宣揚佛教，普利眾生」，可知此座宗喀巴像應歸屬於乾隆四十六至四十七年（1782－1783）同批製作的佛像。蔡玫芬編，《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頁84-85，圖15；陳慧霞，〈清乾隆金宗喀巴像〉，《故宮文物月刊》，第200期（1999），頁134-135。

⑳ 關於兩類佛舍利的概念，參見John S. Strong, *Relics of the Buddh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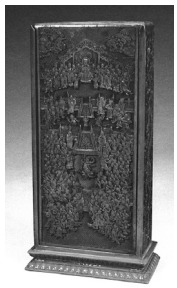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表，如2020年2月美國大學藝術協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在芝加哥舉辦的第108屆年會 “Sensual Texts, Material Histories: Languag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主題分組；2020年12月11日，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主辦的「清宮的多宗教與跨文化空間」教師學術沙龍中，獲李翎教授、郭亮教授、王廉明博士、孫悅博士、程方毅副教授等師友指正及鼓勵。李曉欣博士、童凌驁先生以及故宮博物院館員為提件觀摩及拍攝圖檔提供協助，在此一併致謝。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慷慨指正。文中一切錯漏之處，概為筆者責任。

（責任編輯：陳昱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雕漆道教神像匣及御書道經

編號	藏地	尺寸	匣面紋飾	原配經書	圖版
1	北京故宮博物院（書9570，御2298/2299），天穹寶殿陳設	立式：通高34.8公分，通長15.3公分，寬6.8公分；底座長17.5公分，寬8.9公分	正面：剔紅雕道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太上黃庭外景景玉經二卷》（二冊一函），清乾隆九年（1744）暮春之初九州清晏高宗弘曆寫本 版框：縱23.3公分，橫12.7公分 開本：縱30公分，橫12.7公分 經函：高5公分，長30.1公分，寬13.4公分	
2	私人藏；美國歐雲伉儷（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舊藏，1983年倫敦Spink & Son Ltd持有	立式：通高34.5公分，通長15.5公分，寬6.5公分 底座長17.5公分，寬8.8公分	正面：剔紅雕道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清乾隆」三字被挖，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太上黃庭外景景玉經二卷》御筆墨刻本	

資料出處：

1.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10-115，圖22。

2.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no. 60, pp. 152-153.

3.Christie's online catalogue: https://www.christies.com/lotfinder/lot/a-rare-and-finely-carved-red-lacquer-6189807-details.aspx?from=salesummery&intobjectid=6189807&sid=03a5b747-4a33-4605-950d-8e25ab02fcc4. Accessed March 04,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雕漆佛教神像匣及御書佛經

編號	藏地	尺寸	匣面紋飾	原配經書	圖版
1	北京故宮博物院（書9529），中正殿區寶華殿陳設	立式：通高34.6公分，通長15.4公分，寬6.6公分； 底座長17.6公分，寬8.9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冊一函），清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夏六月高宗弘曆寫本 版框：縱23.7公分，橫11.5公分 開本：縱29.7公分，橫11.5公分 經函：高5公分，長30.1公分，寬13.4公分	
2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108976）	立式：通高約34.8公分，長15.5公分，寬6.6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不詳	
3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109974）	立式：通高約34.6公分，長15.5公分，寬6.6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不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藏地	尺寸	匣面紋飾	原配經書	圖版
4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115233）	立式：通高約34.8公分，長15.5公分，寬6.6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帶檀木須彌底座	不詳	
5	北京故宮博物院（故115330）	立式：通高約34.6公分，長15.5公分，寬6.6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不詳	
6	北京故宮博物院（書9502，御2177-86），寧壽宮佛堂陳設	橫式：高27公分，長26公分，寬25公分	立墻：剔紅雕佛教神像四面 頂蓋：陽文「乾隆御書楞嚴經」隸體直書款，海水雲紋、四海龍王諸神 邊框：連續回紋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冊二函），清乾隆丙寅年（十一年，1746）四月朔書至八月望高宗弘曆寫本 版框：縱14.4公分，橫9公分 開本：縱21.3公分，橫9.6公分 經函：高23公分，長22.2公分，寬11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藏地	尺寸	匣面紋飾	原配經書	圖版
7	南京博物院	立式：通高35.4公分，長16公分，寬7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佛說賢首經》（一冊一函），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夏六月高宗弘曆寫本 開本：縱29.9公分，橫12.7公分	
8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FE.55-1983）；帕爾默伉儷（Mr. and Mrs. R.H. Palmer）舊藏	立式：通高34.5公分，底座長17.5公分，寬8.8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立墻：游龍海水江崖紋	不詳	
9	私人藏；巴黎蘇富比2017年拍賣品（Lot 122）	立式：通高36.9公分	正面：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帶乾隆年款之背面被切截 立墻：雙龍卷雲紋 邊框：連續回紋	不詳	
10	私人藏；蘇黎世闊樂2010年拍賣品（Lot 275）	立式：長31.5公分，寬13.5公分	殘件，僅存經匣屜板，剔紅雕佛教神像一面	不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出處：

1.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37-141，圖27。

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16-121，圖23。

3.李久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漆器》，頁38-39，圖24。

4.徐湖平主編，《中國古代漆藝》（南京：南京博物院，2001），圖14。

5.奚可禎，〈南京博物院藏乾隆皇帝御書《佛說賢首經》〉，頁92-96。

6.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d67834e9c8284158a91c940c5f0ca38a.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6b68a8288ed945dbbff5713e44074bc3.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c1df6330847446f7856d1229d925061b.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2d37cb5b4b4c4cd685c721f5678ad75a.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20.

7.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collections search: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7115/box-for-a-unknown. Accessed April 27, 2018.

8.Sotheby's online catalogue:
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2017/arts-asie-pf1707/lot.122.html. Accessed May 27, 2018.

9.Koller Auction's online catalogue:
https://www.kollerauktionen.ch/en/300516-0001-----1154-KAISERLICHER-SCHNITZLACKDECKE-1154_41809.html?RecPos=111. Accessed March 04,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其他特製雕漆經匣及御書佛經

編號	藏地	尺寸	匣面紋飾	原配經書	圖版
1	北京故宮博物院（書9504）	立式：高11公分，長31.6公分，寬22.2公分	正面：剔紅雕釋迦牟尼、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諸神將 背面：陽文「大清乾隆年敬製」隸體直書款，雙龍海水江崖紋 側壁：游龍海水江崖紋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一冊一函），清乾隆辛巳年（二十六年，1761）夏四月望日高宗弘曆寫本 版框：縱23公分，橫18.3公分 開本：縱29公分，橫18.5公分 經函：高8公分，長29公分，寬19.5公分	
2	北京故宮博物院（書9534），寧壽宮佛堂陳設	橫式：高10.8公分，長33.1公分，寬19.2公分	蓋面：剔紅雕行龍卷雲紋 側壁：游龍戲珠、海水江崖紋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六卷》（三冊一函），清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高宗弘曆寫本 版框：縱24.7公分，橫16.3公分 開本：縱30.1公分，橫16.3公分	

資料出處：

1.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86-191，圖40。

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42-147，圖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晉）不著撰者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收入《道藏》，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宋）不著撰者
《太上九天延祥滌厄四聖妙經》，收入《道藏》，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全5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宮中硃批奏摺，江蘇巡撫安寧〈奏為奉辦大紅雕漆經箱明年三月告竣送京事〉，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檔號：04-01-14-0015-042。
（清）王傑等敕編
《欽定秘殿珠林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內府鈔本影印，1988。
（清）吳振域撰
《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宋）法賢譯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8冊，經號891，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全45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
（唐・天竺）般剌密帝譯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收入雍正敕修，《乾隆大藏經》，第26冊，北京：中國書店，2010。
（清）高宗弘曆
《御製文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御製詩四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7-13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照等敕編
《欽定秘殿珠林初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清內府鈔本影印，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梁丘子撰
《修真十書・黃庭內景玉經註》，收入《道藏》，第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北京：故宮博物院發行，1925-1930。
（明）許仲琳撰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明萬曆間金閶載陽舒文淵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
《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唐）達磨栖那譯
《大妙金剛大甘露軍拏利焰鬘熾盛佛頂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經號96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近人論著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
1988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
Thuken Losang Chökyi Nyima (*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Chen, Qing-ying and Lian-long Ma, trans.
1988 *Zhangjia guoshi Ruobi Duoji zhuan* (A Biography of the National Preceptor Changkya Rölpé Dorjé),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大羽恵美
2007 〈中央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八大菩薩と併置される仏と守門神〉，《密教図像》，26巻，頁13-30。
Oba, Emi
2007 "Chūou Chibetto niokeru hachidai bosatsu to heichi sareru Butsu to sumon-shin (A Study on Buddha, Eight Bodhisattvas and Gate Keepers in Central Tibet)," *Mikkyō zuzō* (Journal of Buddhist Iconography), vol. 26, pp. 13-30.
于薇
2018 《聖物製造與中古中國佛教舍利供養》，北京：文物出版社。
Yu, Wei
2018 *Shengwu zhizao yu zhonggu Zhongguo fojiao sheli gongyang* (The Making of Sacred Objects and Buddhist Relics Enshrinement in Medieval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田勇次郎
1960 《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東京：二玄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0 〈黃庭経諸本鑑賞記〉，收入氏著，《中國書論集》，東京：二玄社，頁83-136。

Nakata, Yūjirō

1960 *Ō Gishi o chūshin to suru hōjō no kenkyū* (A Study of Model Calligraphy: Centered on Wang Xizhi), Tōkyō: Nigensha.

1980 "Kōtei-kyō shohon kanshō ki (Notes on Connoisseurship of the Edition of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 in Yūjirō Nakata, *Chūgoku shoronshū* (Collected Articl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ōkyō: Nigensha, pp. 83-136.

王子林

2007 《紫禁城原狀與原創》（上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4 〈雍正帝所建斗壇與燒丹考〉，《故宮學刊》，第12輯，頁206-229。

Wang, Zi-lin

2007 *Zijincheng yuanzhuang yu yuanchuang* (The Original State and Innovations of the Forbidden City), 2 vol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The Daoist Altars to the Dipper Erected by the Yongzheng Emperor and the Contemporary Alchemistic Activities,"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vol. 12, pp. 206-229.

王元林

2013 〈東亞地區墓葬壁畫十二辰圖像的起源與流變〉，《考古學報》，第3期，頁325-346。

Wang, Yuan-lin

2013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Zodiac Animal Figures in the Tomb Murals in East Asia,"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25-346.

王明

1984 〈《黃庭經》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頁539-574，後收入氏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24-371。

Wang, Ming

1984 "Huangting jing kao (Research on the *Scripture of Yellow Cour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20 (1948), pp. 539-574; in Ming Wang, *Daojia he daojiao sixiang yanjiu* (A Study of Daoist Philosophy and Daoist Religious Thoug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pp. 324-371.

王家鵬

1996 〈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文物》，第10期，頁57、86-92。

Wang, Jia-peng

1996 "Tuer-bate donggui yu 'Wanfa guiyi tu' (Torghuts Pledging Allegiance to the Qing Rule and *Ten Thousand Dharmas Return as One*),"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57, 86-92.

王家鵬主編

2009 《梵華樓》（全4卷），北京：故宮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Jia-peng, ed.
2009 *Fanhua lou* (Pavilion of Brahma Flower), 4 vol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王崇齊
2012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比勘記〉,《故宮學術季刊》，30卷2期，頁257-303。

Wang, Chong-ci
2012 "The Contrast of Ching Gaozong's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0, no. 2, pp. 257-303.

王微
2006 〈乾隆裕陵棺槨藏文經咒釋讀〉,《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頁48-65。

Wang-Toutain, Françoise
2006 "An Interpretation and Reading of Tibetan Scripture Found on the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t Yuli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48-65.

孔令偉
2013 〈《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收入沈衛榮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640-650。

Kung, Ling-wei
2013 "*Lengyanzhou* yu *Dabaisan'gai tuoluoni jing* zai Qianlong *Dazang quanzhou* zhong de jiaohui: jianlun Qian Jia hanxue zhifeng de 'luxue' beijing (The Convergence of *Śūraṅgama Mantra* and *Sitātapatrā Dhāraṇī* in *Dazang quanzhou*: Study on Manchurian Transliteration of Tibetan Mantra and the Influence on Philolog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Wei-rong Shen, ed., *Han Zang foxue yanjiu: wenben, renwu, tuxiang he lishi* (Studies of Sino-Tibetan Buddhism: Text, Figure, Image, and History), Beijing: Chinese Tibetology Press, pp. 640-650.

尹翠琪
2017 〈《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3期，頁1-140。

Wan, Cui-ki Maggie
2017 "Research on the Edition, Formation, and Images of the Frontispieces to the *Daozang*,"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43, pp. 1-140.

石濱裕美子
2011 《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Ishihama, Yumiko
2011 *Shinchō to Chibetto Bukkyō: bosatsuō to natta Kenyūtei* (Qing Dynasty and Tibetan Buddhism: Emperor Qianlong as the Boddhisatva King), Tōkyō: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斯
2003 《中國宮廷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Xiang, Si
2003 *Zhongguo gongting shanben* (Rare Book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祁小春
2007 〈王羲之與道教的關聯〉，收入氏著，《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506-584。
Qi, Xiao-chun
2007 "Wang Xizhi yu daojiao de guanlian (Wang Xizhi's Relationship with Daoism)," in Xiao-chun Qi, *Maishi zhifeng: youguan Wang Xizhi ziliao yu renwu de zonghe yanjiu* (Demeanor that Transcends Tim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Wang Xizhi and Related Source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pp. 506-584.
李久芳主編
2006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漆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Li, Jiu-fang, ed.
2006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Lacquer Wares of th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ers;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李信軍主編
2011 《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Li, Xin-jun, ed.
2011 *Shuilu shenquan: Beijing Baiyunguan cang lidai daojiao shuiluhua* (A Complete Pantheon of Gods from Myriad Realms: Daoist Water-Land Ritual Paintings from Successive Dynasties Collected by the Baiyun Temple in Beijing), Hangzhou: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沙武田
2009 〈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薩曼荼羅圖像遺補〉，《敦煌研究》，第5期，頁18-24、126-127。
Sha, Wu-tian
2009 "Supplementary Notes of the Presentations of the Mandala with Vairocana and the Eight Great Bodhisattvas in Cave 25 at Yulin Grottoes," *Dunhuang Research*, no. 5, pp. 18-24, 126-127.
何芳
2003 〈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頁45-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 Fang
2003 "An Analysis of the Portraits in the Thangkas of the Eighteen Arhats Made in the Qianlong Reign,"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45-58.
吳錚強、杜正貞
2011 〈北宋南郊神位變革與玉皇祀典的構建〉,《歷史研究》, 第5期, 頁47-58。
Wu, Zheng-qiang, and Zheng-zhen Du
2011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 of Deities in the Sacrifice to Heave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crificial Rituals of the Jade Emperor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Research*, no. 5, pp. 47-58.
林藜編
1980 《長城萬里》, 臺北：錦繡出版社。
Lin, Li, ed.
1980 *Changcheng wanli* (Thousands of Miles of the Great Wall), Taipei: Jinxiu chubanshe.
段文傑、樊錦詩主編
2006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5・敦煌初唐》, 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
Duan, Wen-jie, and Jin-shi Fan, eds.
2006 *Zhongguo Dunhuang bihua quanji wu: Dunhuang chu Ta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rals at Dunhuang Grottos in China, vol. 5: Early-Tang Dunhuang), Tianjin: Tianj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故宮博物院編
1992 《清代宮廷繪畫》,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 北京：故宮出版社。
The Palace Museum, ed.
1992 *Qingdai gongting huihua* (Court Painting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4 *Gugong bowuyuan cangpin daxi–shanben tecang bian shiliu: yubi xiejing*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Special Collections of Rare Books, vol. 16: Imperially Transcribed Scripture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柳存仁
1991 〈毘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 收入氏著,《和風堂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1045-1094。
Liu, Ts'un-yan
1991 "Pishamen tianwang fuzi yu Zhongguo xiaoshuo zhi guanxi (The Relationship of Vaiśravaṇa and His Son with Chinese Fictions)," in Ts'un-yan Liu, *Hefengtang wenji*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Hefengtang 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pp. 1045-10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席琳
2014 〈吐蕃禪定印毗盧遮那與八大菩薩組合圖像研究〉,《考古與文物》，第6期，頁41-48。
Xi, Lin
2014 "A Study of the Iconographic Combination of Dhyana-Mudra Vairocana and Eight Bodhisattvas in the Tubo Period,"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41-48.
施靜菲
2012 《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Shih, Ching-fei
2012 *Radiant Luminance: The Painted Enamelware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奚可禎
2016 〈南京博物院藏乾隆皇帝御書《佛說賢首經》〉,《文物》，第2期，頁92-96。
Xi, Ke-zhen
2016 "Nanjing bowuyuan cang Qianlong huangdi yushu *Foshuo xianshou jing* (The *Sūtra of Bhadraśri* Imperially Transcrib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Museum),"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92-96.
徐湖平主編
2001 《中國古代漆藝》，南京：南京博物院。
Xu, Hu-ping, ed.
2001 *Zhongguo gudai qiyi* (Lacquer Art of Ancient China), Nanjing: Nanjing Museum.
徐廣源
1997 《清東陵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5 《皇陵舊照裡的清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Xu, Guang-yuan
1997 *Qing Dongling shihua*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Eastern Qing Tomb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15 *Huangling jiuzhao lide Qingshi* (Qing History Reflected in Old Photos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mpany, Ltd.
翁連溪
2013 《清代內府刻書研究》(上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Weng, Lian-xi
2013 *Qingdai Neifu keshu yanjiu* (A Study of Book Printing at the Imperial Household of the Qing Dynasty), 2 vol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翁連溪編
2007 《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廣陵書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ng, Lian-xi, ed.
2007 *Qing Neifu keshu dang'an shiliao huibian* (Compendium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n Book Printing in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Yangzhou: Guangling shushe.
翁連溪、李洪波編
2014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全82冊），北京：中國書店。
Weng, Lian-xi, and Hong-bo Li, eds.
2014 *Zhongguo fojiao banhua quan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ed Illustrations in China), 82 vols., Beijing: Zhongguo shudian.
陶金
2015 〈欽安遺珍：欽安殿藏宋徽宗玉簡與十二雷將神像畫〉，《紫禁城》，第5期，頁66-81。
2015 "Qin'an yizhen: Qin'andian cang Song Huizong yujian yu shier leijiang shenxianghua (Treasured Legacy in the Hall of Imperial Peace: A Jade Slip of the Song Emperor Huizong and Paintings of Twelve Thunder Marshalls in the Hall of Imperial Peace)," *Forbidden City*, no. 5, pp. 66-81.
陳捷、張昕
2016 〈裕陵地宮石刻圖像與梵字的空間構成和場所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頁40-57。
Chen, Jie, and Xin Zhang
2016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osition, Concept and Design of the Stone Images and Sanskrit Script in the Chamber of Yuling Mausoleum,"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40-57.
陳晶主編
1998 《中國漆器全集4・三國—元》，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Chen, Jing, ed.
1998 *Zhongguo qiqi quanji si: Sanguo–Yua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Lacquerware, vol. 4: The Three Kingdoms–Yuan), Fuzhou: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陳粟裕
2009 〈榆林25窟一佛八菩薩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頁56-82、159。
Chen, Su-yu
2009 "A Study of the Iconography of One Buddha with Eight Bodhisattvas in Cave Number 25 at Yulin,"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56-82, 159.
陳慧霞
1999 〈清乾隆金宗喀巴像〉，《故宮文物月刊》，第200期，頁134-135。
Chen, Hui-hsia
1999 "Qing Qianlong jin Zongkaba xiang (A Gold Statue of Tsongkhapa Made in the Qing Qianlong Reig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200, pp. 134-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彭悅柔

2012 〈從檔案論盛清君臣抄寫佛經的特色並淺釋文化意義〉,《史學彙刊》,第29期,頁137-186。

Peng, Yueh-jou

2012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urt Sutras Transcription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Data of Golden Age of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tudies*, no. 29, pp. 137-186.

虞萬里

2001 〈《黃庭經》新證〉,收入氏著,《榆枋齋學術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513-550。

Yu, Wan-li

2001 "*Huangting jing* xinzheng (New Research on the *Scripture of Yellow Court*)," in Wan-li Yu, *Yufangzhai xueshu lunji* (Selected Academic Articles from the Yufangzhai Studio),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pp. 513-550.

詹鎮鵬

2016 〈朱髹增華:明初(1368-1435)官用剔紅器及其相關意涵〉,《故宮學術季刊》,34卷2期,頁1-71。

2018 〈帝國紀勳與地方貢品:乾隆朝《平定臺灣得勝圖》雕漆掛屏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5期,頁189-281。

Zhan, Zhen-peng

2016 "Coating with Vermillion for Luxurious Ornament: Early Ming (1368-1435) Official Carved Red Lacquerware and Related Symbolic Meaning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4, no. 2, pp. 1-71.

2018 "Imperial Imagery and Local Tributes: Research on Carved Lacquer Panels of the Taiwan Campaign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45, pp. 189-281.

廖暘

2007 〈甘肅永登感恩寺金剛殿栱眼壁畫圖像考釋——兼論其空間佈置及十忿怒尊與十大明王的區別〉,收入何星亮、廖暘編,《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52-295。

Liao, Yang

2007 "An Icon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ngyan*' Wall Paintings at Vajra Hall, Gan'en Monastery in Yongde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n Krodhas and Ten Vidyārājas," in Xing-liang He and Yang Liao, eds., *Zongjiao xinyang yu minzu wenhua* (Religious Belief and Ethnic Culture), vol. 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 252-295.

鄧之金編

1999 《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寶頂山石窟》(下),重慶:重慶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ng, Zhi-jin, ed.
1999 *Dazu shike diaosu quanji: Baodingshan shiku*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Dazu Rock Carvings: Baodingshan Grottos), vol. 2,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鄧昭
2014 〈道教斗姆對密教摩利支天形象的借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6期，頁59-108。
Tang, Chiu
2014 "The Borrowing Images of Doumu,"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36, pp. 59-108.
劉世珣
2020 〈用作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運作脈絡〉，《故宮學術季刊》，37卷1期，頁39-71。
Liu, Shih-hsun
2020 "The *Dingzi* Drug as Gift: Its Med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Us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7, no. 1, pp. 39-71.
蔡玫芬編
1999 《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Tsai, Mei-fen, ed.
1999 *Monarchy and Its Buddhist Way: Tibetan Buddhist Ritual Implement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賴依縵
2015 〈各族巧匠工藝結晶：乾隆九年至十一年製五方佛與救度佛母數珠箱〉，《九州學林》，第35期，頁75-110。
Lai, I-man
2015 "Synthesis of Multi-ethnic Artisans' Ingenious Craftsmanship: Reading A Box Containing Prayer Beads with Five Dhyāni-Buddhas and Tārās Made between 1744 and 1746,"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no. 35, pp. 75-110.
賴惠敏、張淑雅
2006 〈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故宮學術季刊》，23卷4期，頁131-171。
Lai, Hui-min, and Shu-ya Chang
2006 "The Yung-ho Temple in the Ch'ien-lung Era: A Cultur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3, no. 4, pp. 131-171.
齋藤龍一編集
2009 《道教の美術》，大阪：読売新聞大阪本社、大阪市立美術館。
Saitō, Ryūichi, ed.
2009 *Dōkyō no bijutsu* (Daoist Art), Ōsaka: Yomiuri shinbun Ōsaka honsha, Ōsaka shiritsu bijutsuk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繼勝主編，謝繼勝、熊文彬、羅文華、廖暘等著
2010 《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上下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Xie, Ji-sheng, ed.; Ji-sheng Xie, Wen-bin Xiong, Wen-hua Luo, Yang Liao, et al.
2010 *Zangchuan fojiao yishu fazhanshi*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t Art), 2 vols., Shanghai: 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
羅文華
2005 《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上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 〈紫禁城太和殿所供符板及其宗教思想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頁6-25。
Luo, Wen-hua
2005 *Longpao yu jiasha: Qinggong Zangchuan fojiao wenhua kaocha* (Dragon Robe and Kāṣāya: An Investig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at the Qing Court), 2 vol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09 "The Wooden Talismanic Tablets Enshrined in the Roof of Supreme Harmony Hall,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ir Symbolism,"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6-25.
關雪玲
2008 〈關於清宮錠子藥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頁65-75。
Guan, Xue-ling
2008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Dingziyao* in the Qing Dynast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6, pp. 65-75.
Baldrian-Hussein, Farzeen
2004 "The Book of the Yellow Court: A Lost Song Commentary of the 12th Century," *Cahiers d'Extrême Asie*, vol. 14, pp. 187-226.
Berger, Patricia
2003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hou, Wen-shing
2018 *Mount Wutai: Visions of a Sacred Buddhist Mountai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Pamela Kyle
2002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arner, Harry
1966 "Diaper Backgrounds on Chinese Carved Lacquer," *Ars Orientalis*, vol. 6, pp. 165-189.
Gesterkamp, Lennert
2011 *The Heavenly Court: Daoist Temple Paintings in China, 1200-14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eenwood, Kevin R. E.
2013 “Yonghegong: Imperial Universalism and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Beijing’s ‘Lama Templ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Jenyns, R. Soame, and William Watson
1965 *Chinese Art: The Minor Arts*, vol. II,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Ko, Dorothy
2017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roll, Paul W.
1996 “Body Gods and Inner Vis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49-155.
Little, Stephen, and Shawn Eichman, et al.
2000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organ, David
2005 *The Sacred Gaze: Religious Visual Cul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wski, Evelyn S.
2003 “Re-imagin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1, no. 1, pp. 1-29.
Rawski, 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
2005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Schipper, Kristofer
1975 *Concordance du Houang-t’ing King: Nei-king et Wai-king*,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s, eds.
2004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har, Meir
2015 *Oedipal God: The Chinese Nezha and His Indian Origi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trong, John S.
2004 *Relics of the Buddh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ajracharya, Gautama V.
2014 “Kirtimukha, the Serpentine Motif, and Garuda: The Story of a Lion that Turned into a Big Bird,” *Artibus Asiae*, vol. 74, no. 2, pp. 311-336.
Waley-Cohen, Joanna
2004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88, pp. 193-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Ching-ling
2017 *Praying for Myriad Virtues: On Ding Guanpeng's The Buddha Preaching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Dortmund: Verlag Kettler.
Wang-Toutain, Françoise
2005 "Les cercueils du tombeau de l'empereur Qianlong," *Arts Asiatiques*, vol. 60, pp. 62-84.
Yoritomi, Motohiro
1990 "An Iconographic Study on the Eight Bodhisattvas in Tibet," in Tadeusz Skorupski, ed., *Indo-Tibetan Studies: Papers in Honour and Appreciation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s Contribution to Indo-Tibetan Studies*,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pp. 271-274.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Digital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d67834e9c8284158a91c940c5f0ca38a.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6b68a8288ed945dbbff5713e44074bc3.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c1df6330847446f7856d1229d925061b. 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2d37cb5b4b4c4cd685c721f5678ad75a.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20.
Christie's online catalogue
https://www.christies.com/lotfinder/lot/a-rare-and-finely-carved-red-lacquer-6189807-details.aspx?from=salesummery&intobjectid=6189807&sid=03a5b747-4a33-4605-950d-8e25ab02fcc4. Accessed March 04, 2020.
Koller Auction's online catalogue
https://www.kollerauktionen.ch/en/300516-0001-----1154-KAISERLICHER-SCHNITZLACKDECKE-1154_41809.html?RecPos=111. Accessed March 04, 2020.
Sotheby's online catalogue
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2017/arts-asie-pf1707/lot.122.html. Accessed May 27, 2018.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collections search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7115/box-for-a-unknown. Accessed April 27,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檀木識文描金經函，北宋慶曆二年（1042），1966年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筆者攝（2015.10.21）。

圖2　朱漆戧金八寶紋夾經板（大聖廣開真義經一卷），約1410年，大英博物館藏（1992,0129,0.1.CH）。筆者攝（2016.09.28）。

圖3　乾隆九年甲子御書《黃庭經》與剔紅神像經匣，174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70）。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no. 60, p. 153.

圖4a-b　匣面「大清乾隆年敬製」款、剔紅道教神像，174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博物院宮中特藏圖像。

圖5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玉皇，私人藏。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6　佚名，《玉皇像》軸，清代，設色絹本，北京白雲觀藏。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47。

圖7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頂層。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8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第二層。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9　佚名，《天帝圖》軸，十四至十五世紀，設色絹本，122.7×63.3公分，東京靈雲寺藏，重要文化財。Stephen Little and Shawn Eichman et al.,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0), no. 108, p. 300.

圖10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第三層。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11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十二辰。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12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四值功曹與判官。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13　佚名，《諸神朝元圖》軸，清代，設色絹本，北京白雲觀藏。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頁197-198。

圖14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王靈官。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15　佚名，《王靈官像》軸，清代，設色絹本，133.5×66公分，北京白雲觀藏。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頁92。

圖16a-c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第四層，二十八宿、斗母。童凌驁拍攝及惠賜照片。

圖17　佚名，《斗姆像》軸，清代，設色絹本，173×80公分，北京白雲觀藏。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頁124。

圖18a-b　乾隆款剔紅神像佛經匣，佛教神像、背面款識，約1744年，高34.5公分，長17.5公分，寬8.8公分，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FE.56-1983）。Photograph by Xiaoxin Li, Copyright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圖19　高宗御書《楞嚴經》剔紅神像經匣（橫式），約1746年，高28公分，長26公分，寬25.2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02）。李久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漆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頁3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頂層，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筆者攝（2016.09.30）。

圖21a-b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第二、三層。筆者攝（2016.09.30）。

圖22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第四層。筆者攝（2016.09.30）。

圖23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哪吒。筆者攝（2016.09.30）。

圖24　佚名，彌勒經變（局部），唐代初期，敦煌莫高窟329窟北壁。段文傑、樊錦詩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5・敦煌初唐》（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2006），頁76-77。

圖25　佚名，《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經首扉畫，清雍正十三年，收入《乾隆大藏經》（1736－1738）。翁連溪、李洪波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北京：中國書店，2014），第42卷，頁229。

圖26　佚名，《萬法歸一》軸，清乾隆，設色絹本，163.8×110.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圖141。

圖27　山西芮城永樂宮《朝元圖》的左右分界圖。Lennert Gesterkamp, *The Heavenly Court: Daoist Temple Paintings in China, 1200-14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fig. 41.

圖28　不動金剛明王、大威德金剛明王，南宋，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22號龕。鄧之金編，《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寶頂石窟卷》（下）（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8-9，圖8-9。

圖29　章嘉・若必多吉編，《三百佛像集》，清乾隆。翁連溪、李洪波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49卷，頁104、136。

圖30　御書道經、佛經及神像匣在紫禁城內安供地點示意圖（橢圓形標記道教，矩形標記佛教）。圖版改自林藜編，《長城萬里》（臺北：錦繡出版社，1980），頁90。

圖31　清宮欽安殿玄天上帝正龕及神位陳設原狀。王子林，《紫禁城原狀與原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上冊，頁146-147。

圖32　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神牌前的供經陳設。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故宮博物院發行，1925-1930），第一編第五冊，卷5，頁106；第二編第六冊，卷2，頁4。

圖33　乾隆九年甲子暮春御書《太上黃庭內景玉經》經首、經尾，174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70）。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110-115，圖22。

圖34　乾隆十至十二年天穹寶殿安供《黃庭經》陳設檔案記錄。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第10冊，頁244。

圖35　寧壽宮佛堂御製《楞嚴經》、御書《瑜伽大教王經》陳設檔案記錄。故宮博物院編，朱賽虹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27冊，頁576。

圖36　高宗御書《楞嚴經》與剔紅神像經匣，1746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0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18。

圖37　高宗御書《智嚴經》與剔紅神像經匣，1744/1748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29）。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38-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8 高宗御書《瑜伽大教王經》與剔紅雲龍紋匣，匣高10.8公分，長33.1公分，寬19.2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34）。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45。

圖39 徐揚，《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卷（局部），1761年，設色紙本，48.9×1342.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00172600000）。故宮Open Data（文物圖檔編號：K2A001726N000000000PAB）。

圖40 高宗御書《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與剔紅神像經匣，約1761年，匣高11公分，長31.6公分，寬22.2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04）。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16・御筆寫經》，頁186-190。

圖41 釋迦牟尼佛與八大菩薩銅像及畫像，梵華樓一室般若品樓上北壁陳設；六品佛畫像，163×29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19994）。王家鵬主編，《梵華樓》（北京：故宮出版社，2009），第1卷，頁142-143，圖75。

圖42a-d 裕陵地宮石刻（局部），八菩薩、四天王。筆者攝（2017.06.08）。

圖43 四大天王與龍王護法神畫像，226×309公分，梵華樓一室般若品樓下東西壁陳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家鵬主編，《梵華樓》，第1卷，頁288，296。

圖44 丁觀鵬摹寫，乾隆御製貫休十六應真像贊（局部），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杭州聖因寺1764年石刻墨搨，原石現藏杭州碑林。

圖45 釋迦牟尼佛銅像，清乾隆，通高39公分，底座寬28公分，梵華樓一室般若品陳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199899 5/9）。王家鵬主編，《梵華樓》，第1卷，頁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檀木識文描金經函　北宋慶曆二年（1042）　1966年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2　朱漆戧金八寶紋夾經板（大聖廣開真義經一卷）　約1410年　大英博物館藏
（1992,0129,0.1.C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乾隆九年甲子御書《黃庭經》與剔紅神像經匣　1744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a 匣面「大清乾隆年敬製」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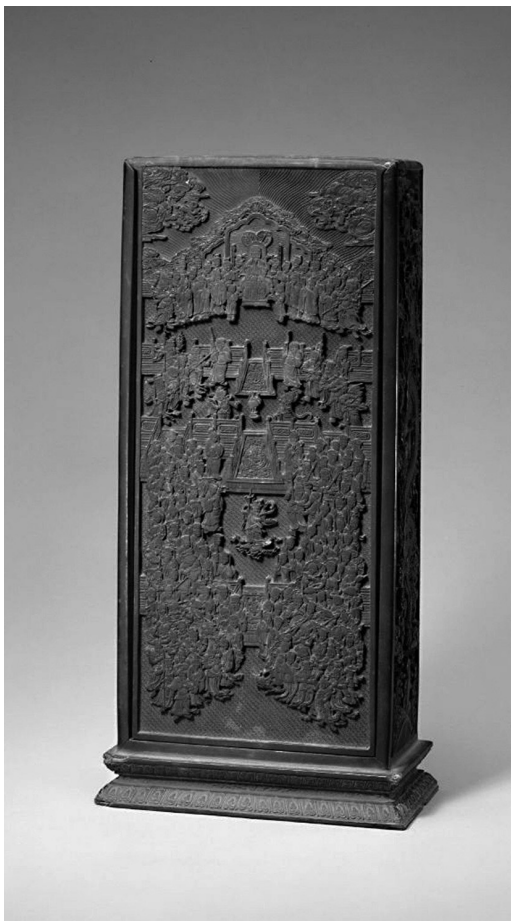


圖4b 匣面剔紅道教神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玉皇 私人藏



圖6 佚名 《玉皇像》軸 清代 設色絹本 北京白雲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頂層



圖8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第二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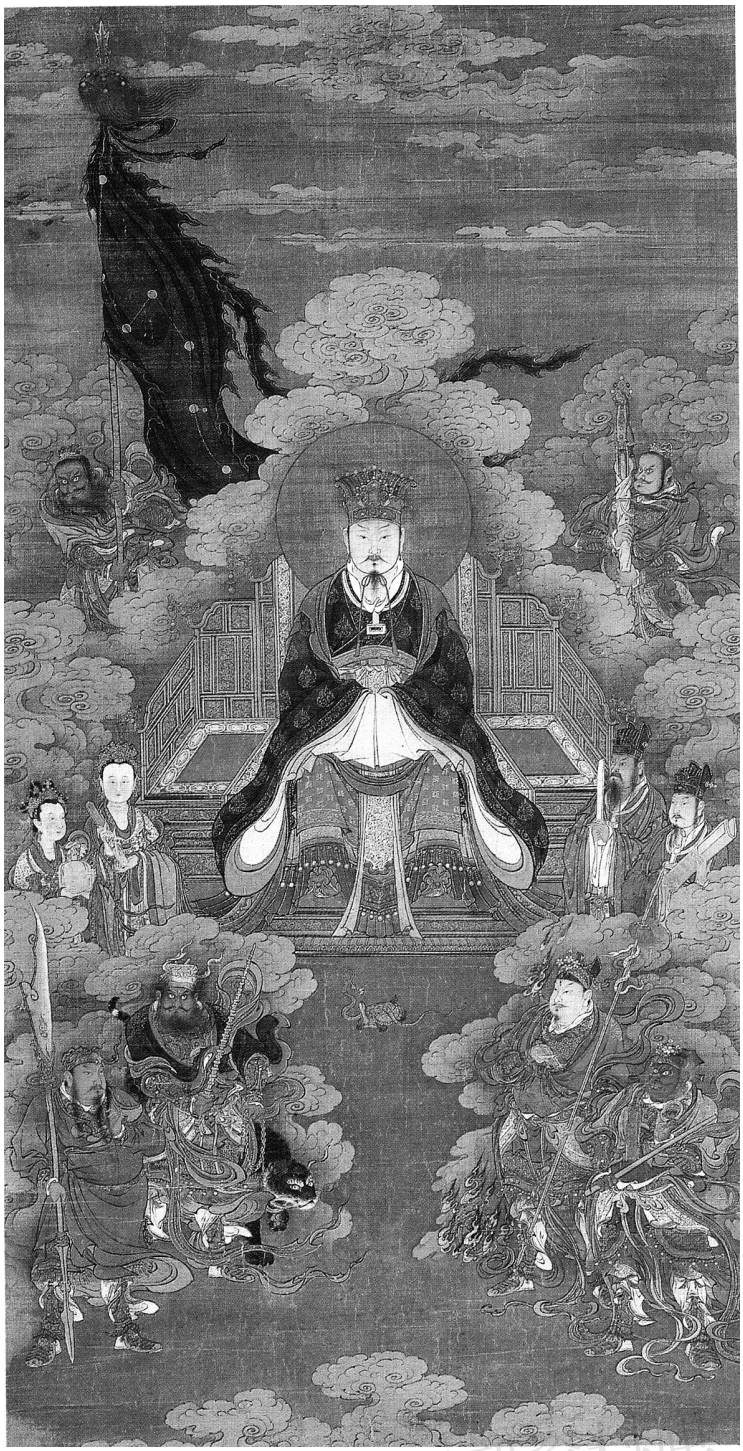


圖9 佚名 《天帝圖》軸 十四至十五世紀 設色絹本 東京靈雲寺藏 重要文化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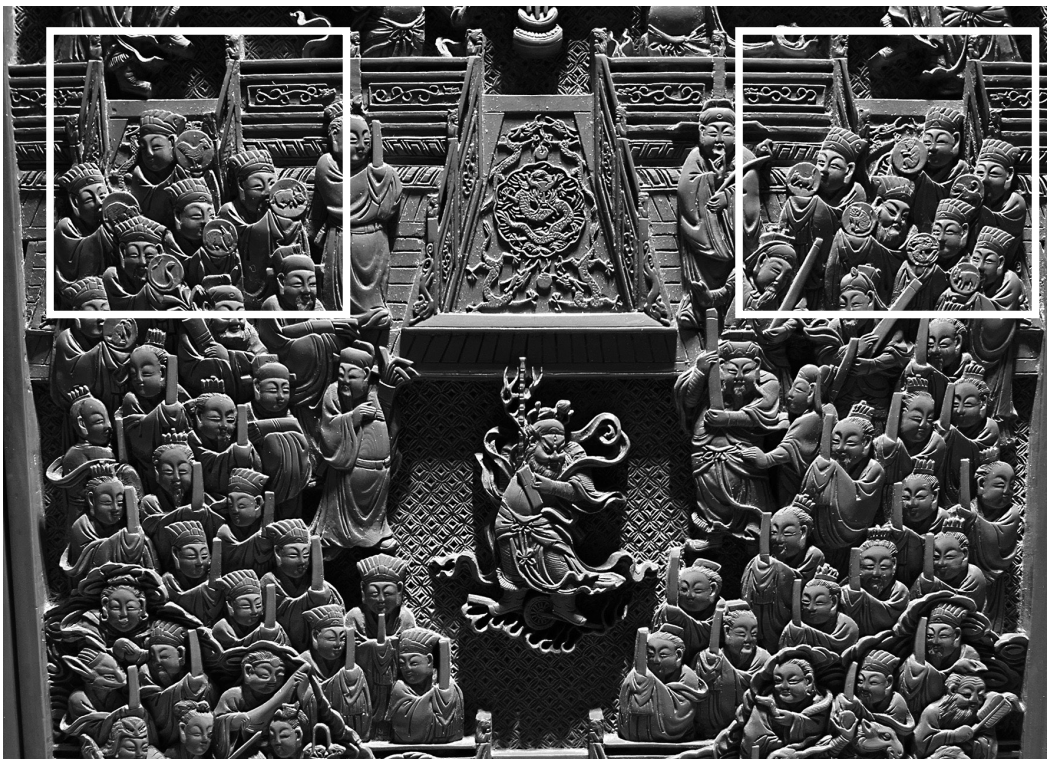


圖10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第三層



圖11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十二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四值功曹與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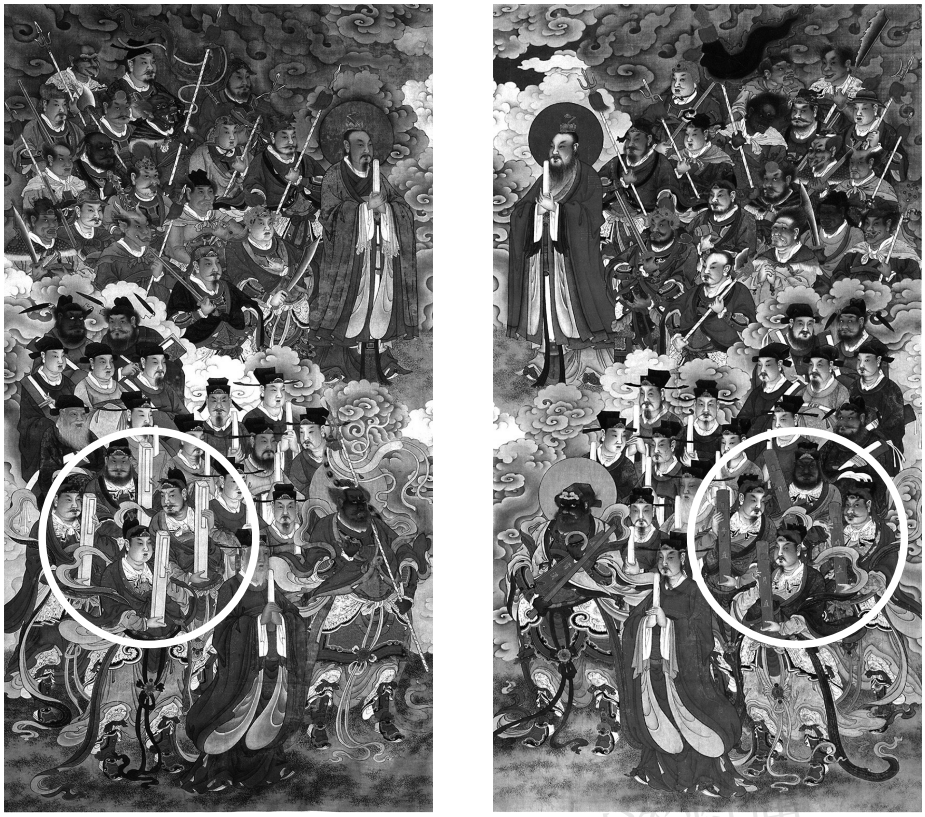


圖13 佚名 《諸神朝元圖》軸 清代 設色絹本 北京白雲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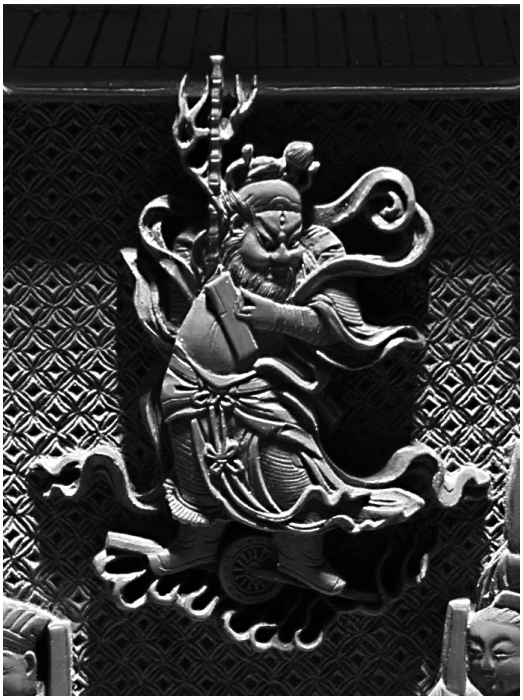


圖14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王靈官



圖15　佚名　《王靈官像》軸　清代
設色絹本　北京白雲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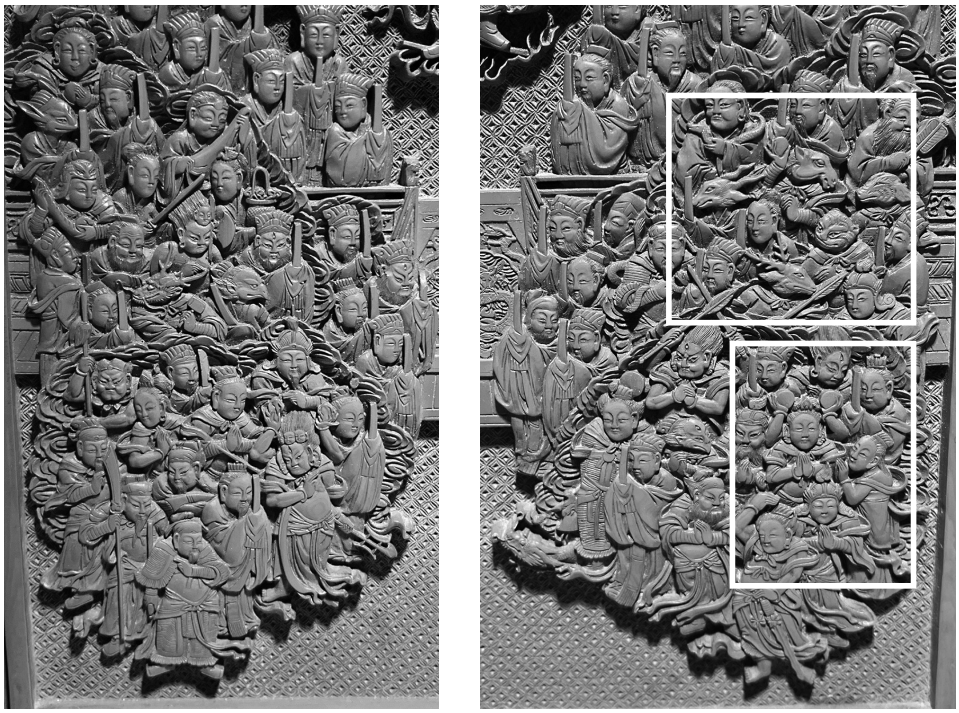


圖16a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第四層



圖16b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二十八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c 剔紅道教神像（局部） 斗母



圖17 佚名 《斗姆像》軸 清代 設色絹本 北京白雲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a-b　乾隆款剔紅神像佛經匣　佛教神像、背面款識　約1744年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FE.56-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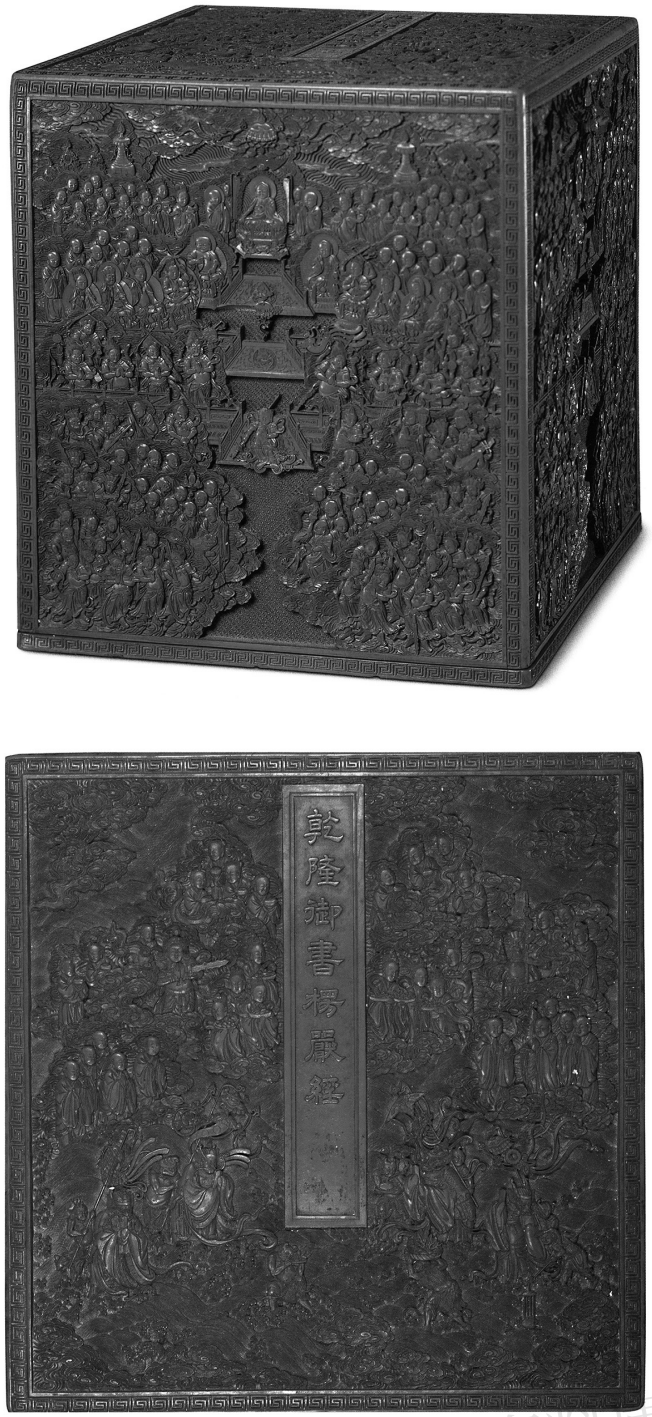


圖19　高宗御書《楞嚴經》剔紅神像經匣（橫式）　約1746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 頂層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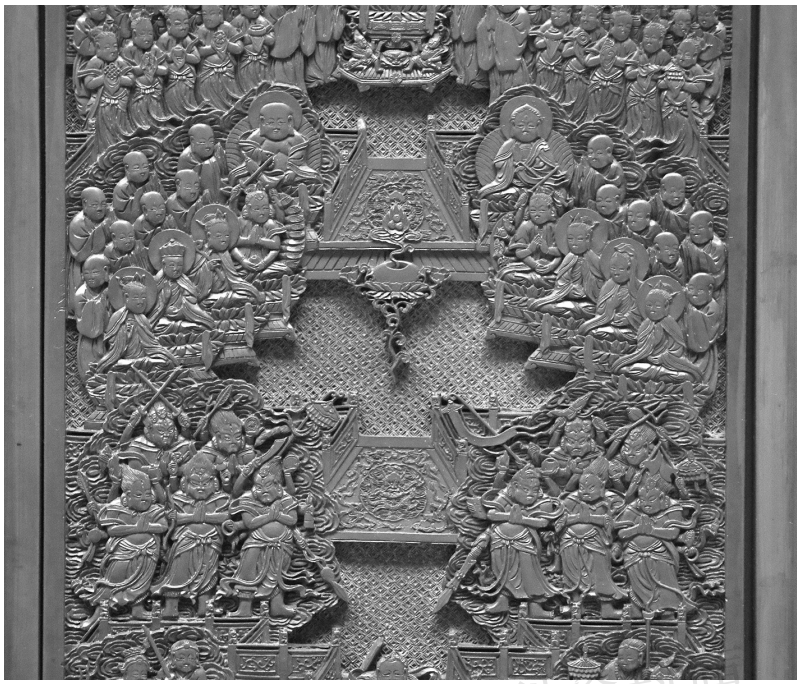


圖21a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 第二、三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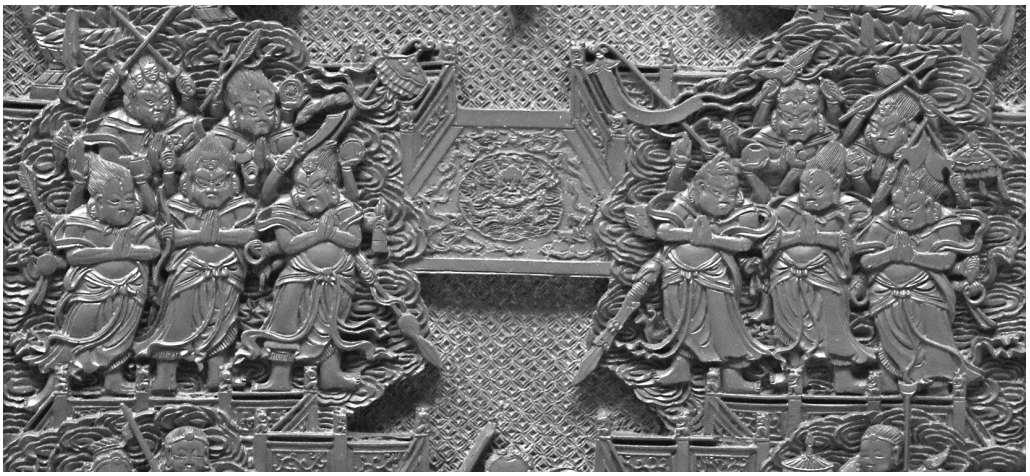


圖21b 剔紅佛教神像匣（局部） 十大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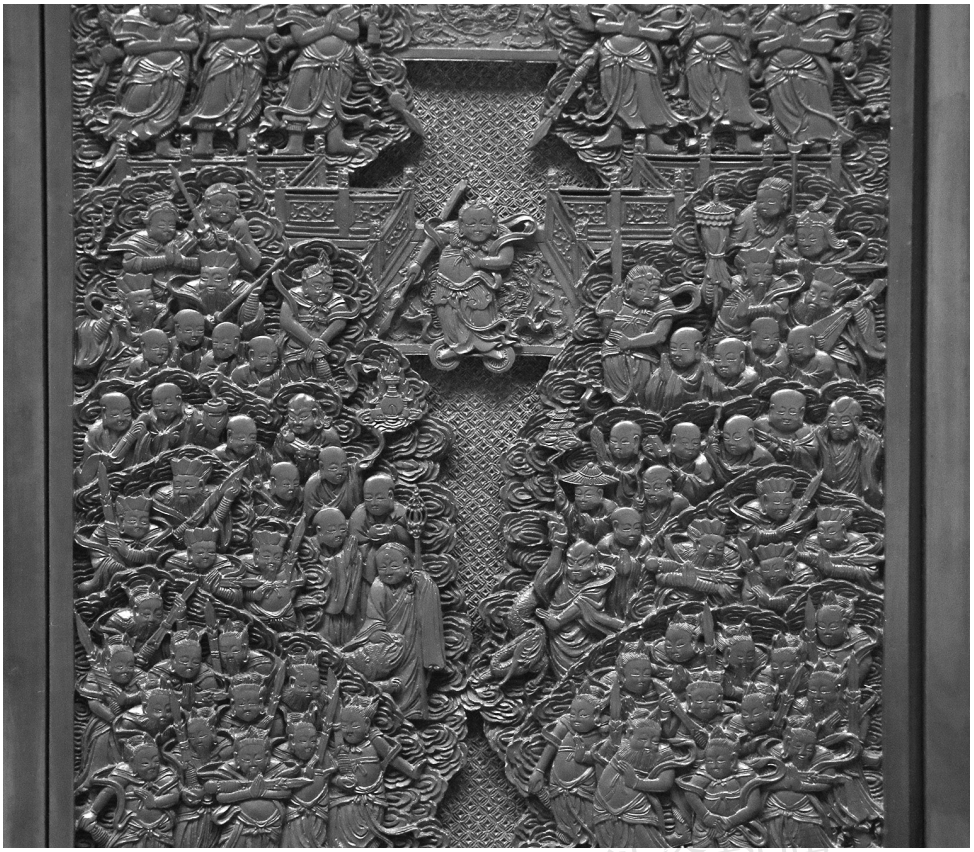


圖22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 第四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 剔紅佛教神像（局部） 哪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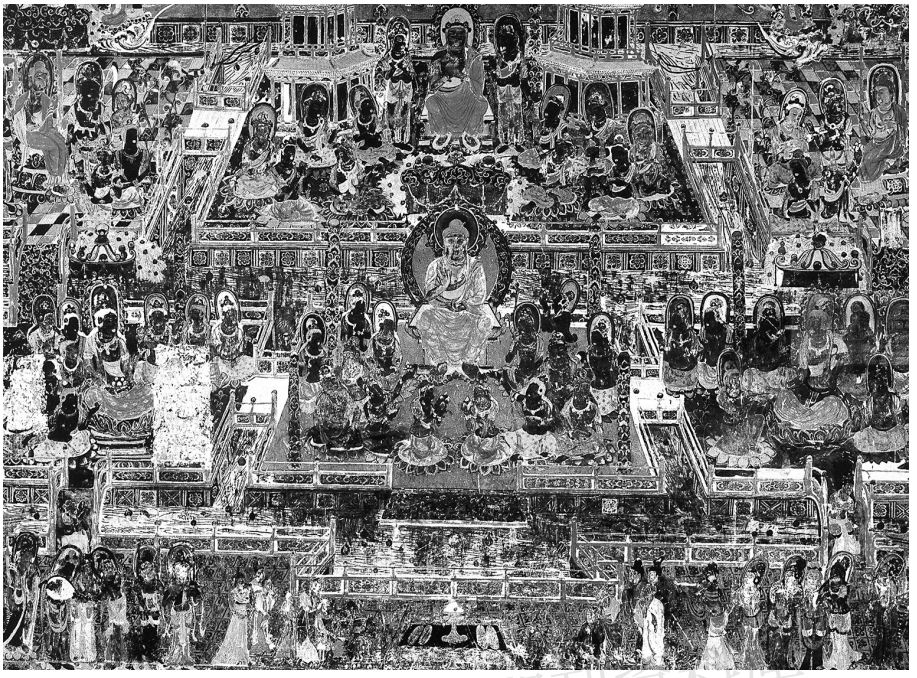


圖24 佚名 彌勒經變（局部） 唐代初期 敦煌莫高窟329窟北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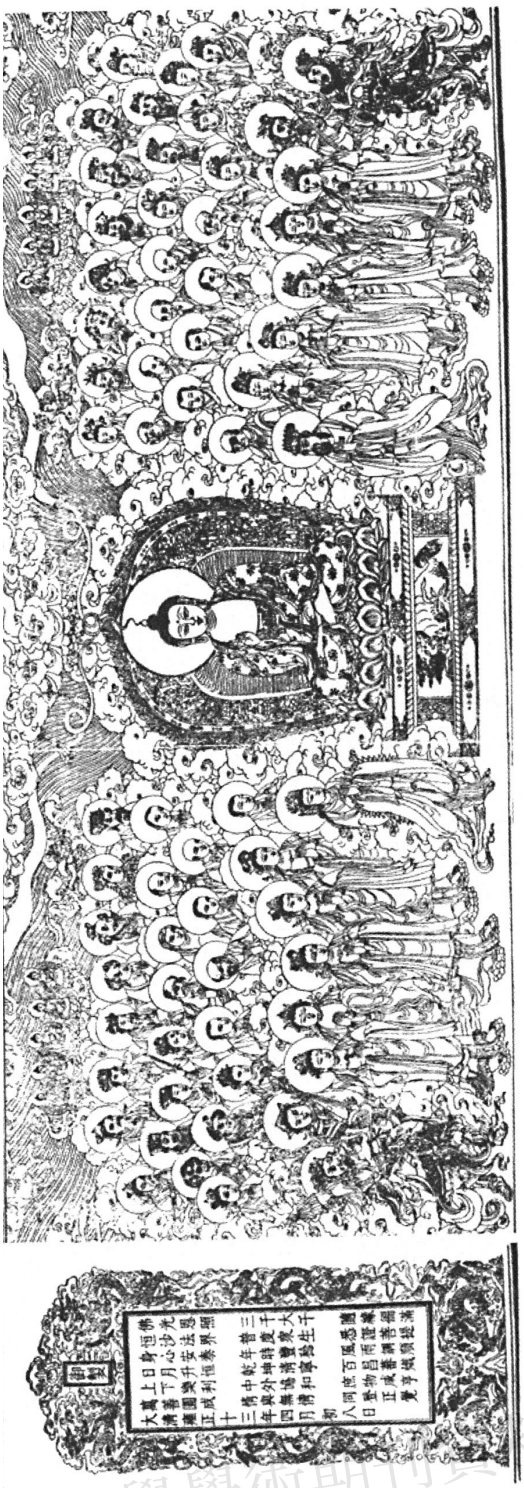


圖25　佚名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經首扉畫　清雍正十三年　收入《乾隆大藏經》（1736－17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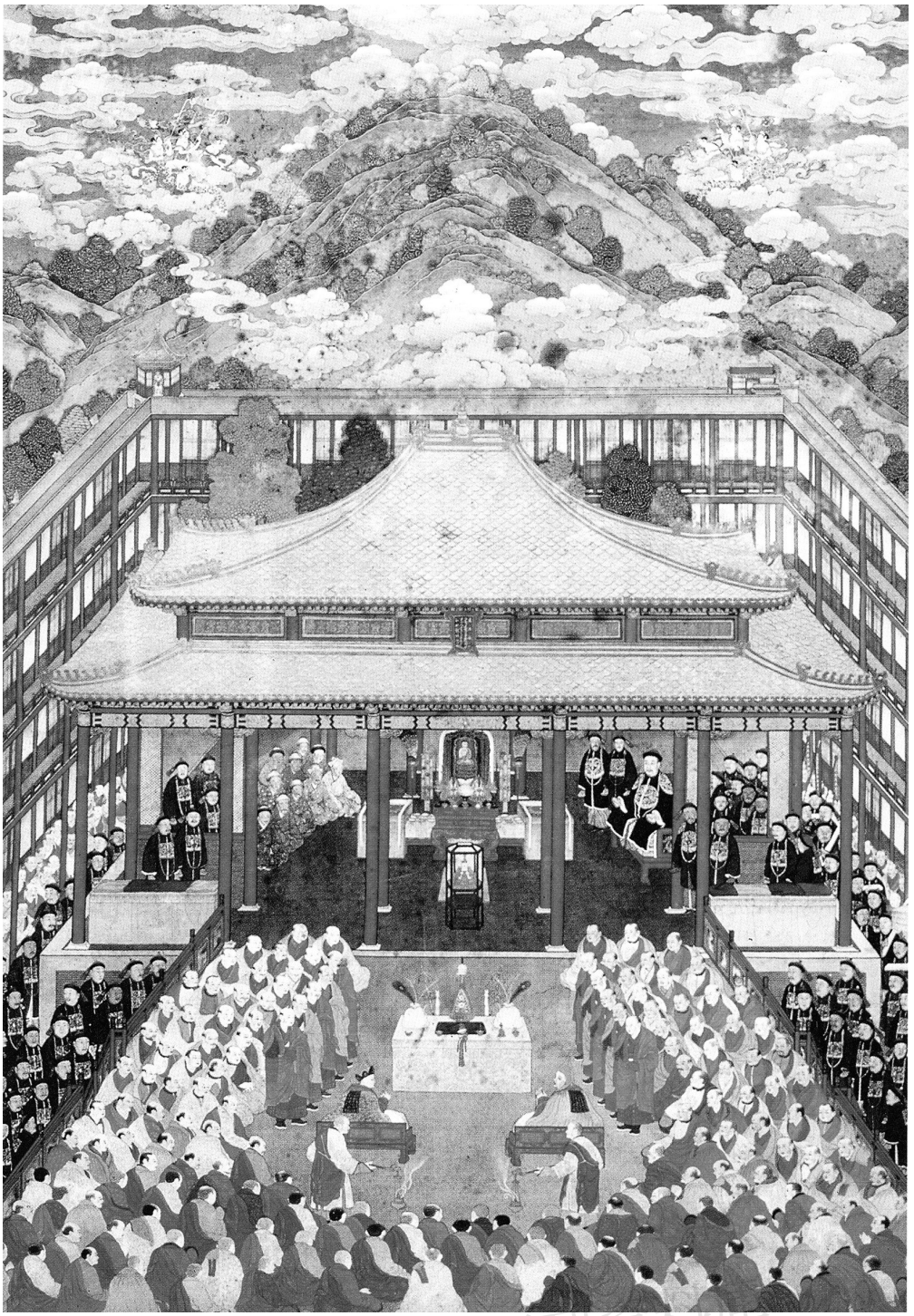


圖26 佚名 《萬法歸一》軸 清乾隆 設色絹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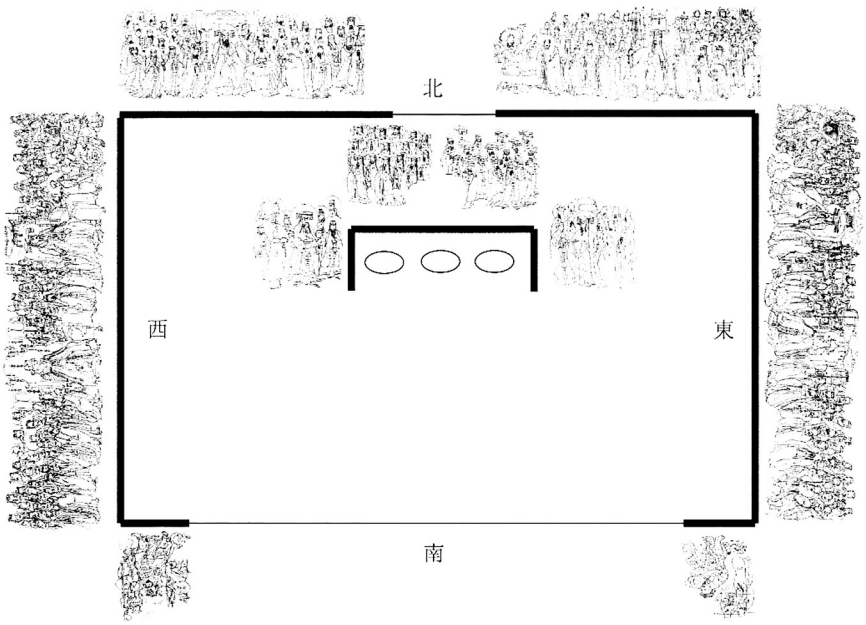


圖27　山西芮城永樂宮《朝元圖》的左右分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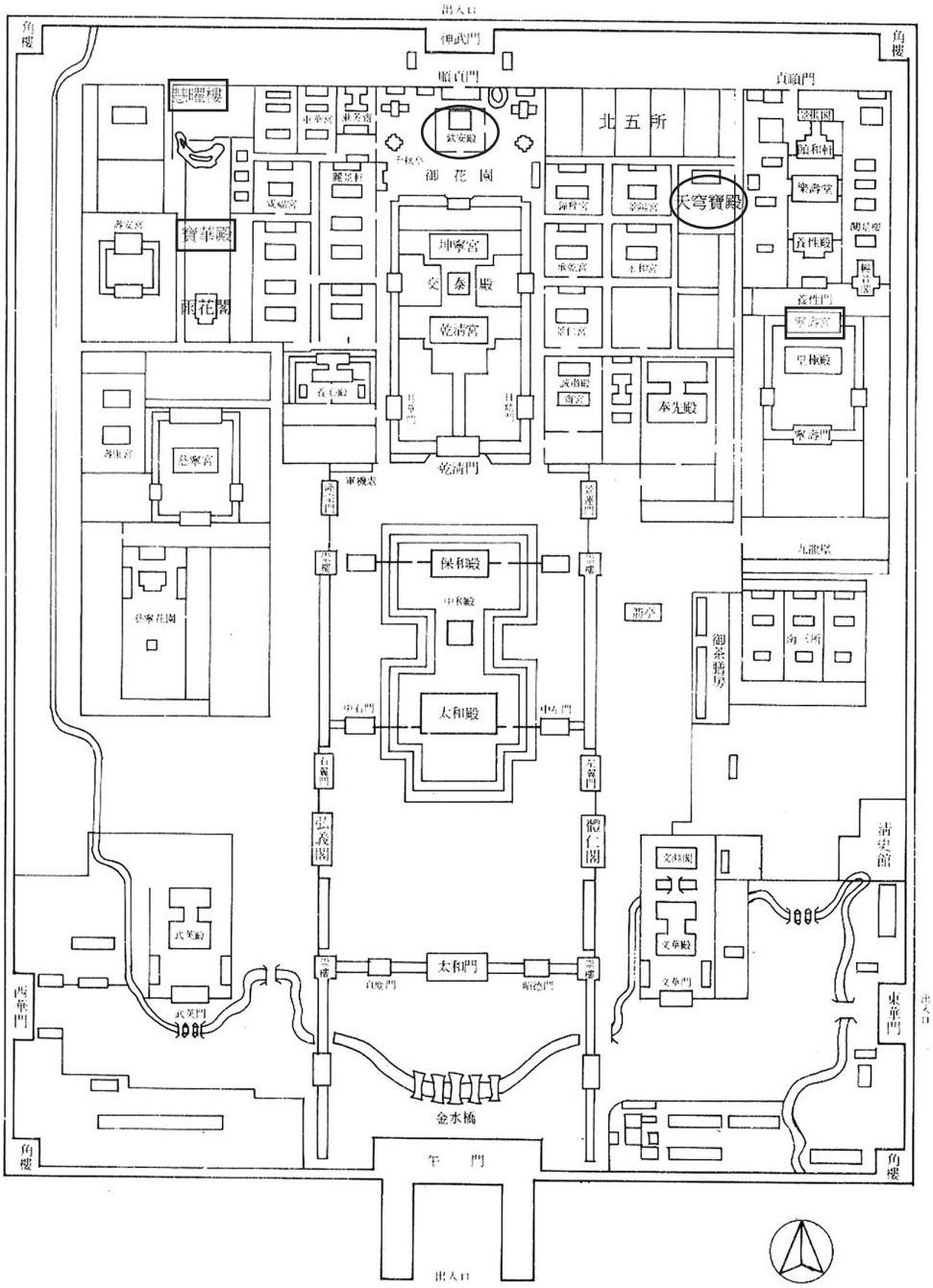
圖28　不動金剛明王、大威德金剛明王　南宋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22號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 章嘉・若必多吉編 《三百佛像集》 清乾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宮平面圖

圖30　御書道經、佛經及神像匣在紫禁城內安供地點示意圖（橢圓形標記道教，矩形標記佛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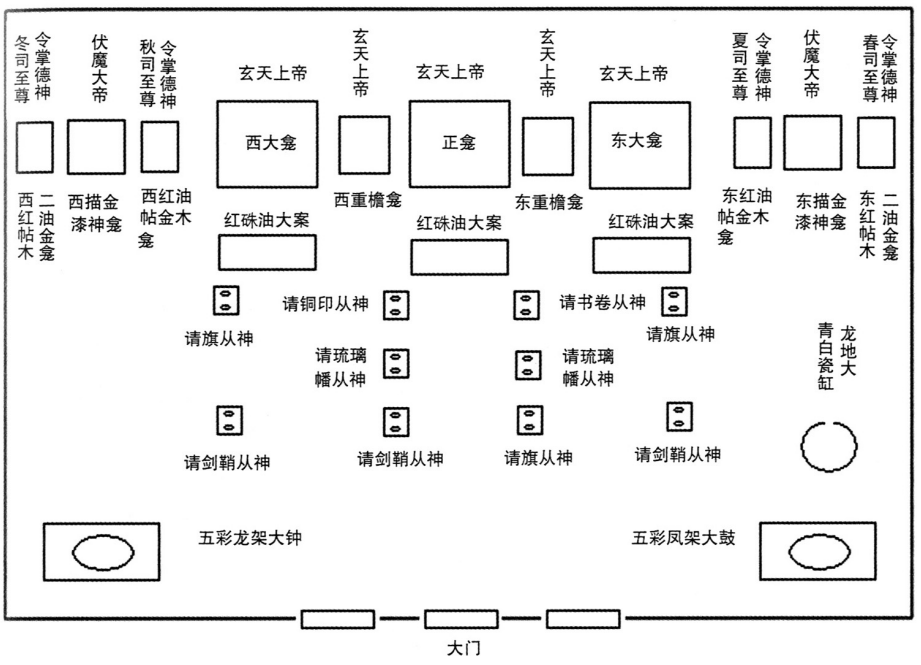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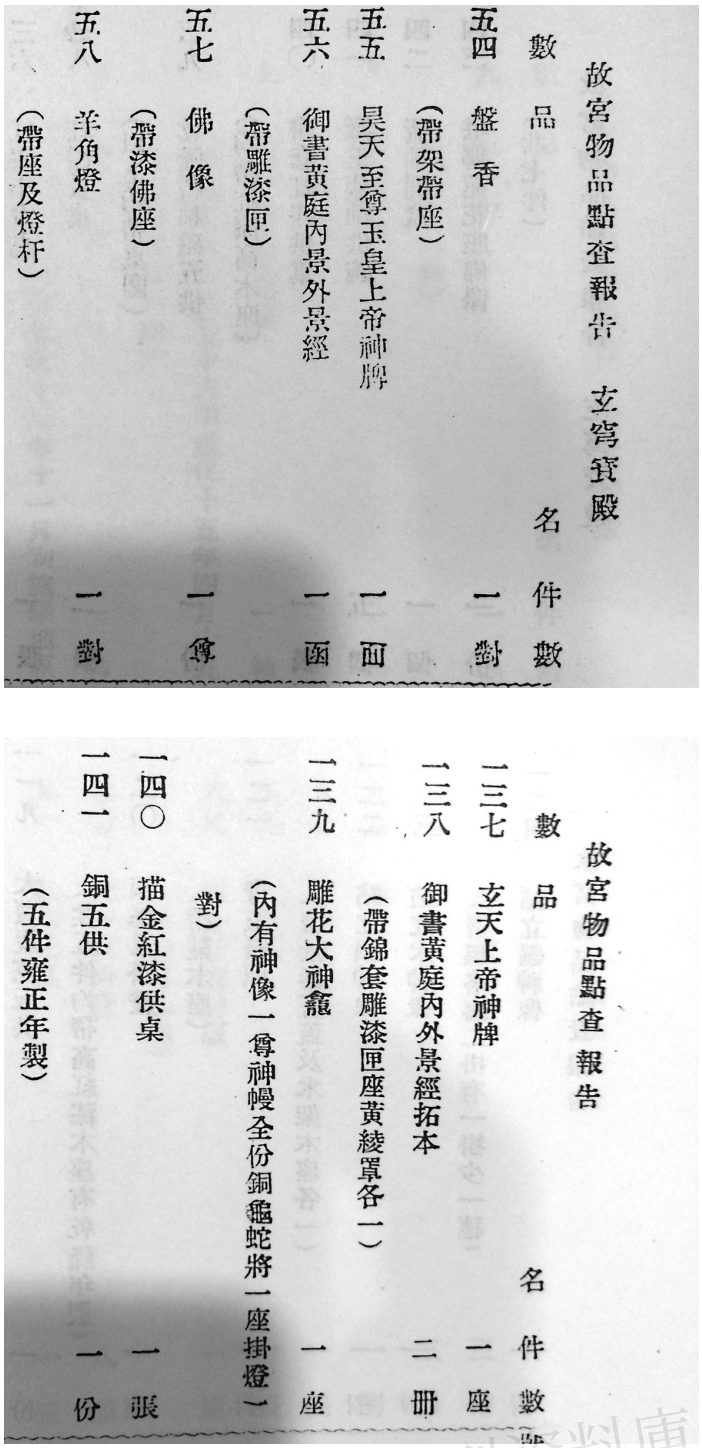




圖31 清宮欽安殿玄天上帝正龕及神位陳設原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玄穹寶殿

數品名	件數
五四　盤香（帶架帶座）	一對
五五　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神牌	一面
五六　御書黃庭內景外景經（帶雕漆匣）	一函
五七　佛像（帶漆佛座）	一尊
五八　羊角燈（帶座及燈杆）	一對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數品名	件數
一三七　玄天上帝神牌	一座
一三八　御書黃庭內外景經拓本（帶錦套雕漆匣座黃綾罩各一）	二冊
一三九　雕花大神龕（內有神像一尊神幔全份銅龜蛇將一座掛燈一對）	一座
一四〇　描金紅漆供桌	一張
一四一　銅五供（五件雍正年製）	一份

圖32　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神牌前的供經陳設　民國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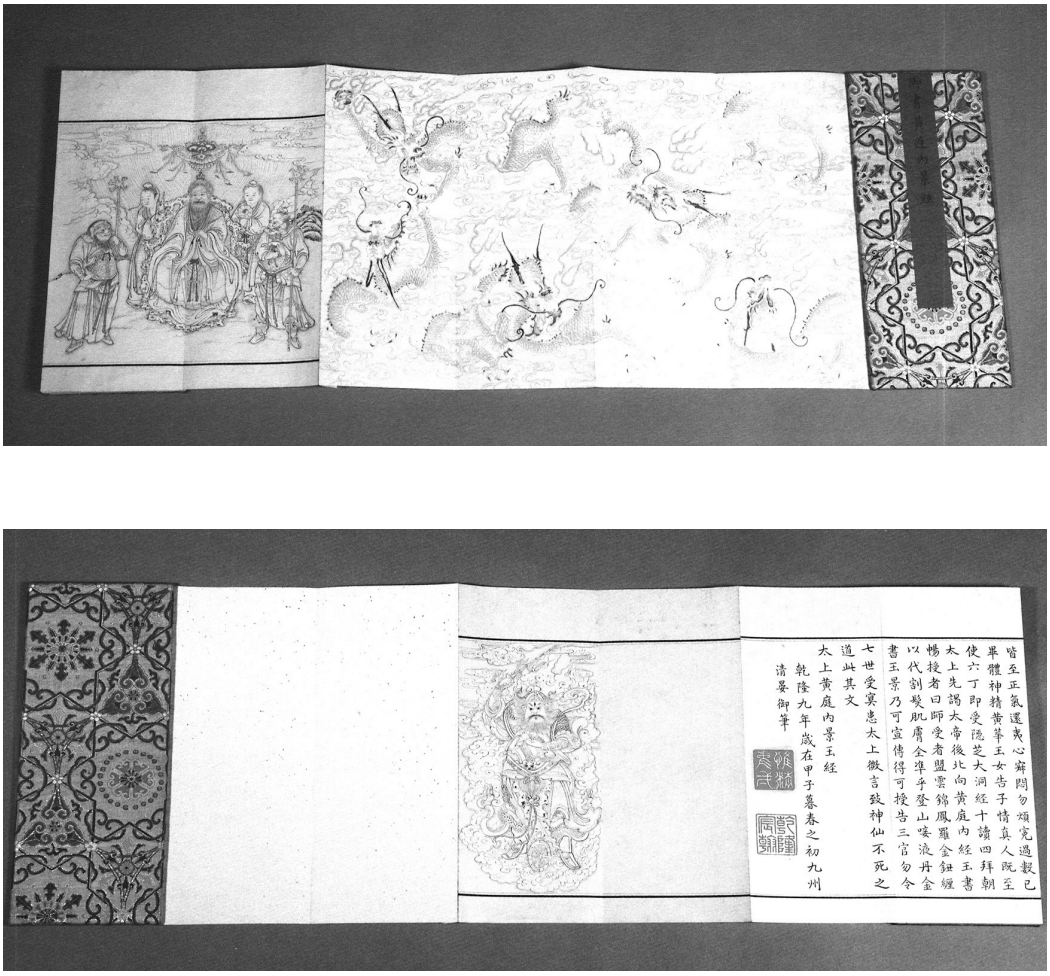


圖33 乾隆九年甲子春正御書《太上黃庭內景玉經》經首、經尾 1744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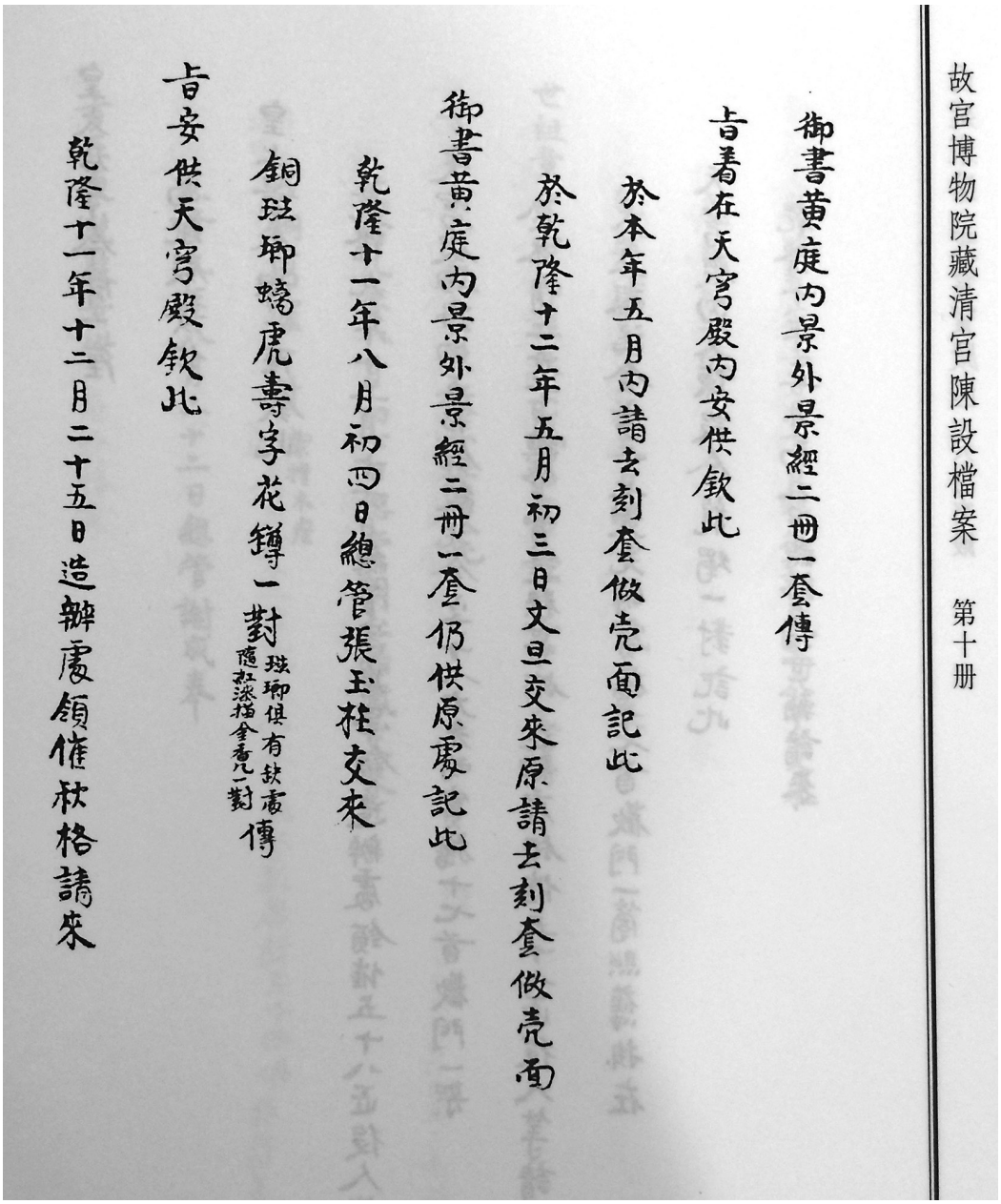


圖34　乾隆十至十二年天穹寶殿安供《黃庭經》陳設檔案記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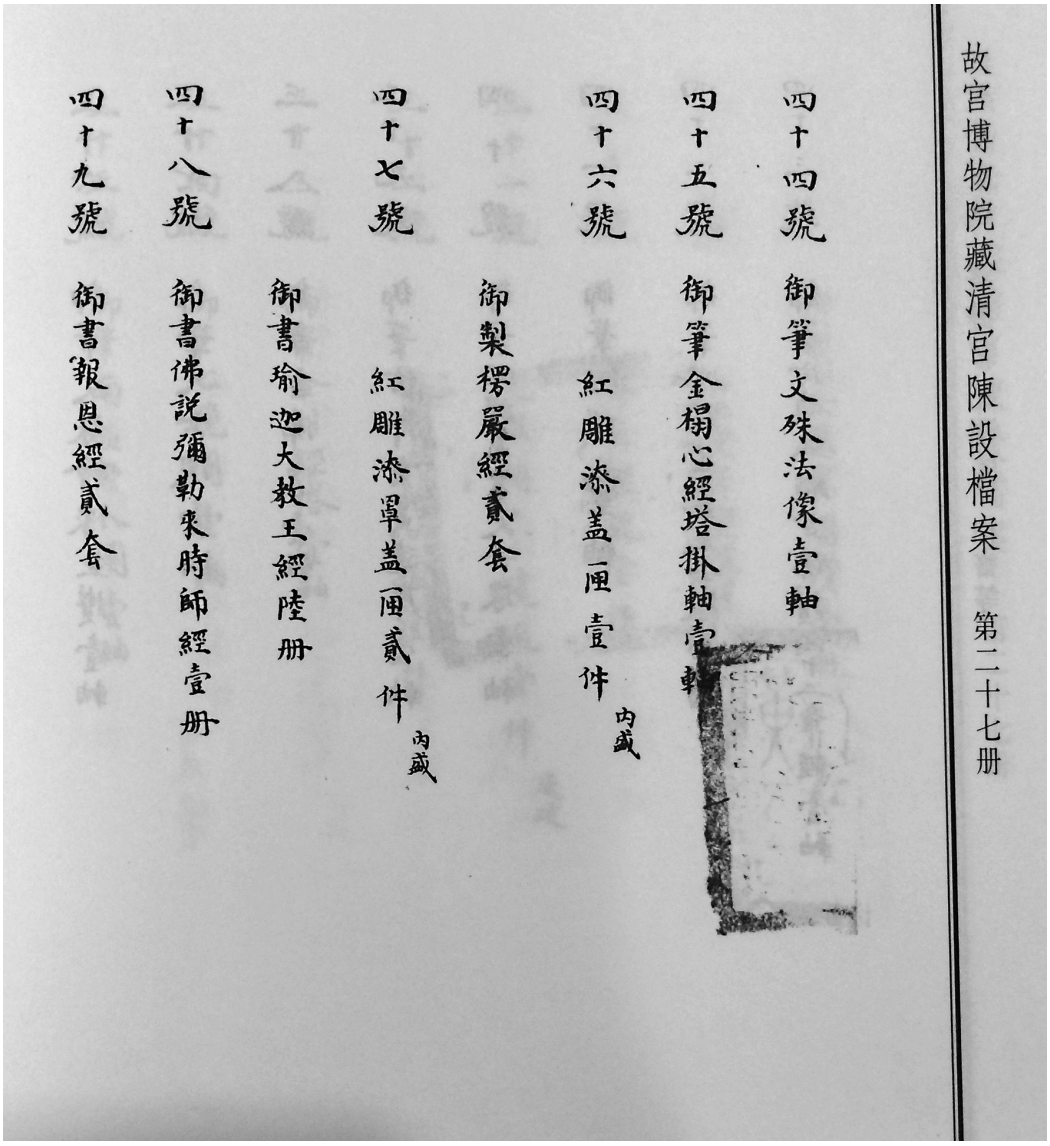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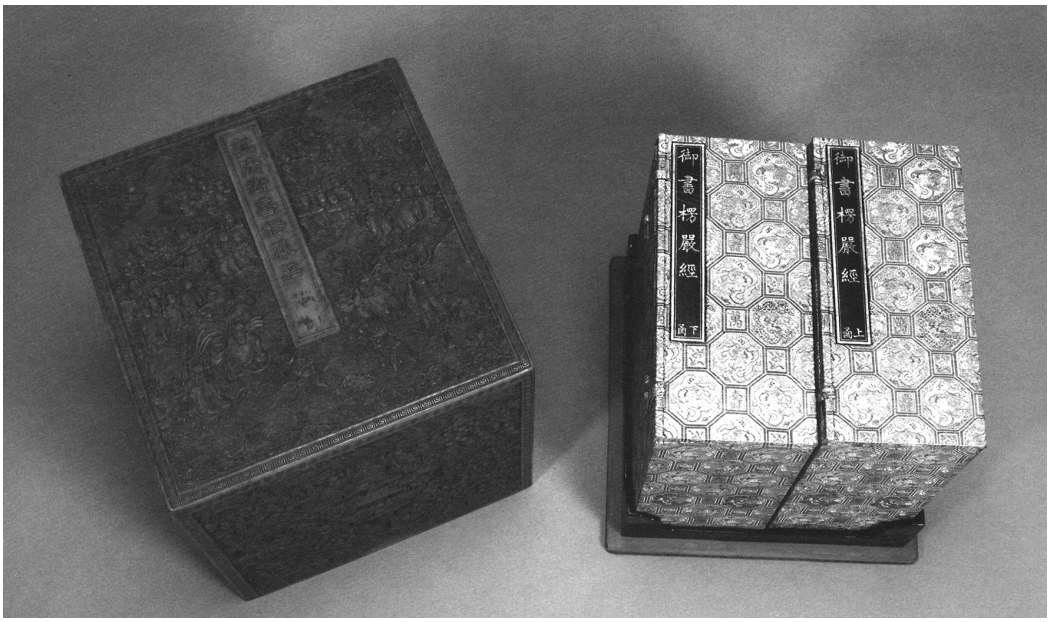


圖35 寧壽宮佛堂御製《楞嚴經》、御書《瑜伽大教王經》陳設檔案記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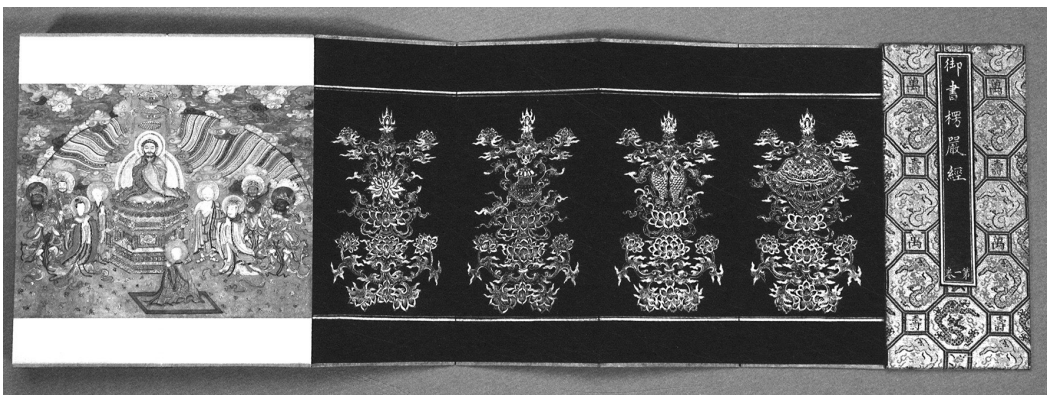


圖36　高宗御書《楞嚴經》與剔紅神像經匣　1746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高宗御書《智嚴經》與剔紅神像經匣 1744/1748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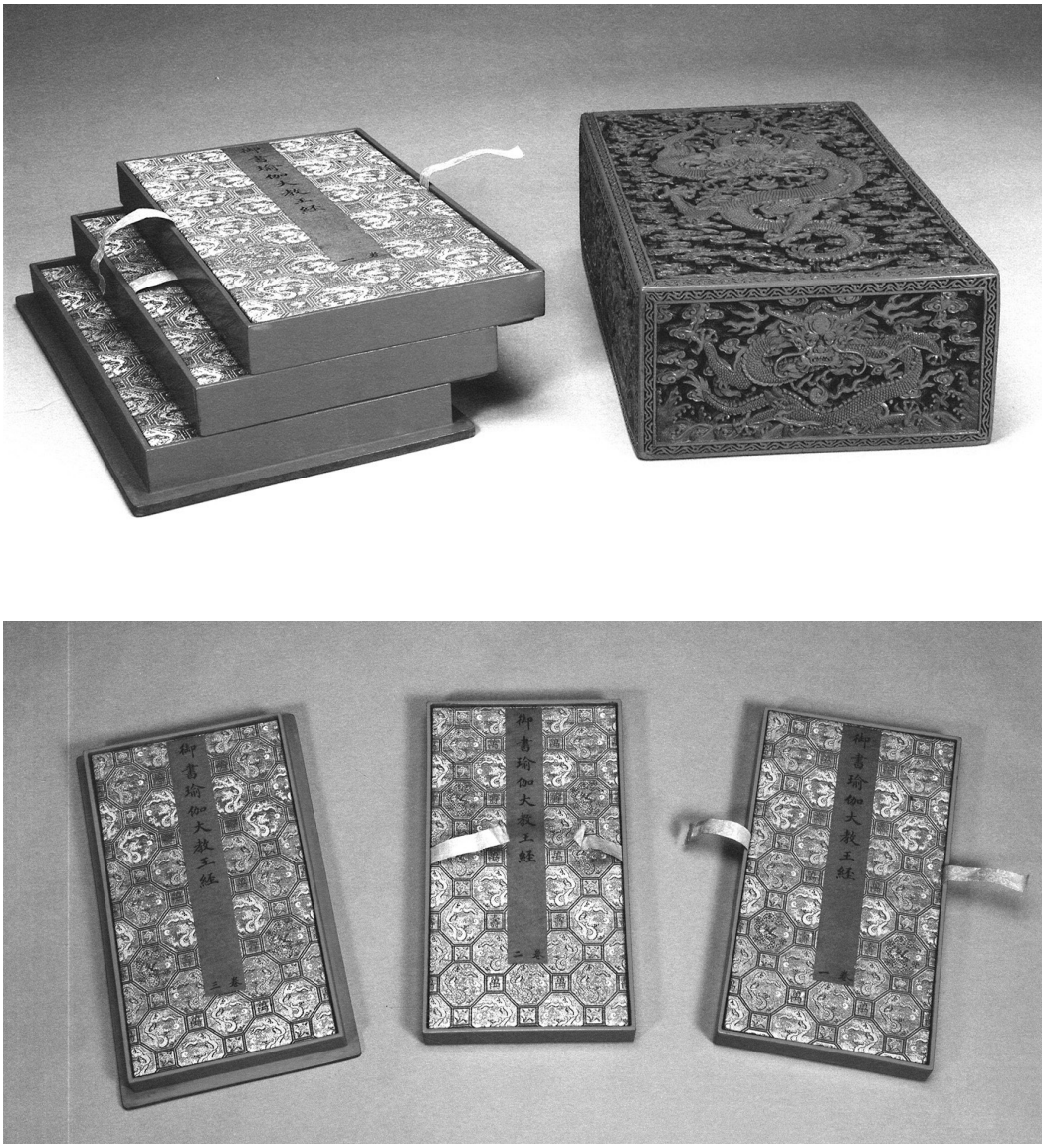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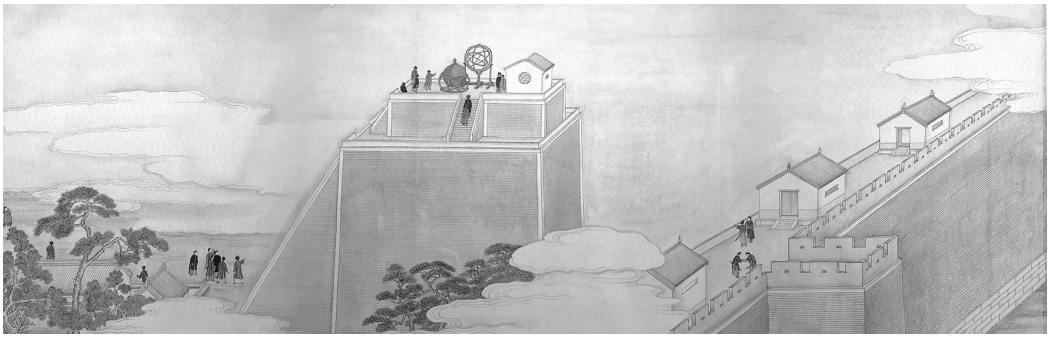


圖38　高宗御書《瑜伽大教王經》與剔紅雲龍紋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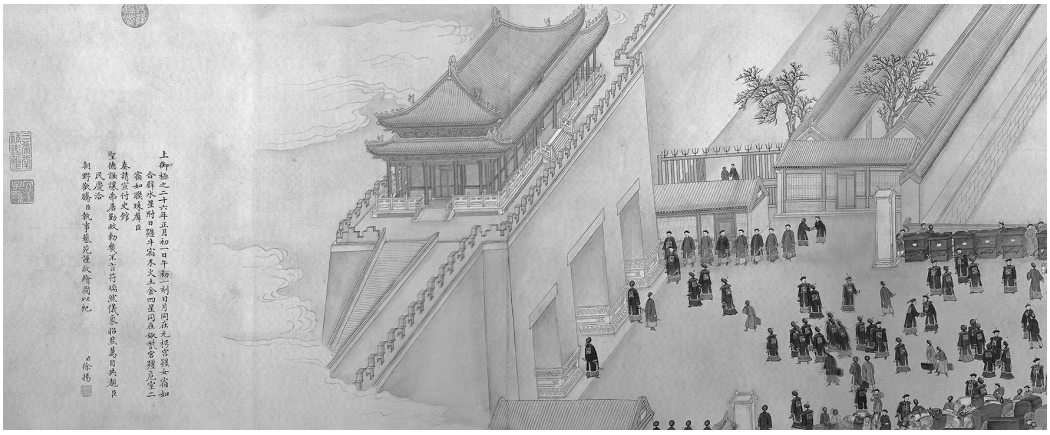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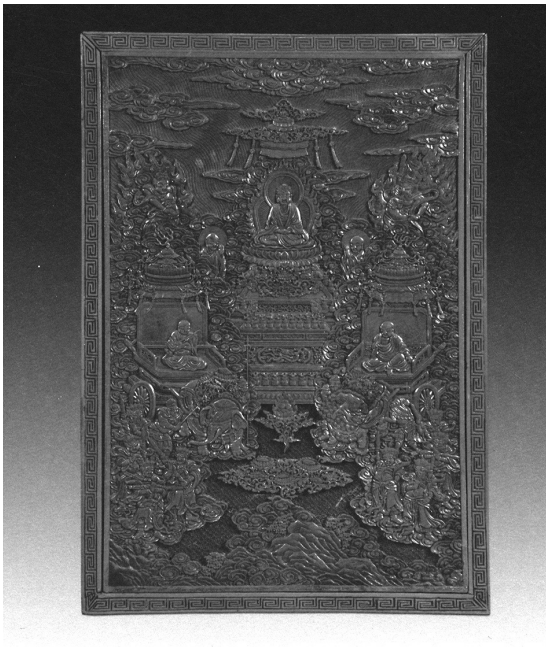


圖39 徐揚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卷（局部） 1761年 設色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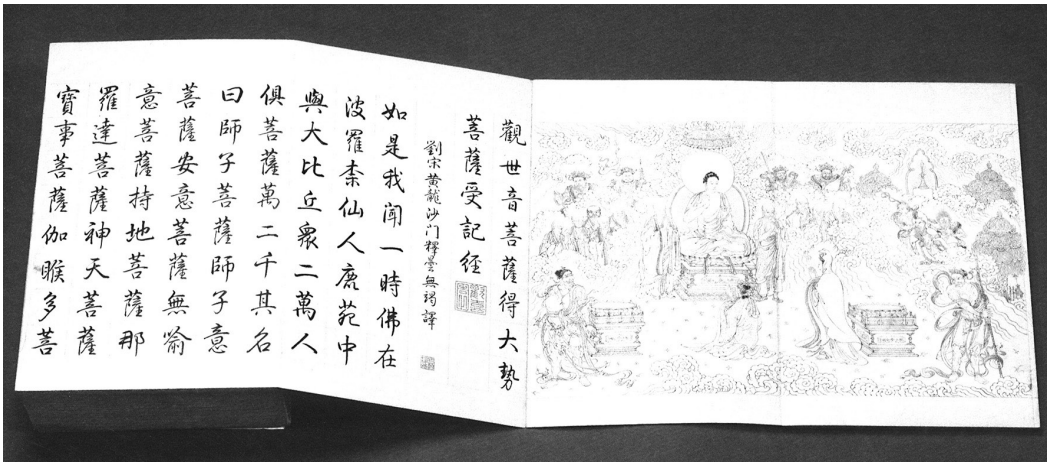


圖40　高宗御書《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與剔紅神像經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書95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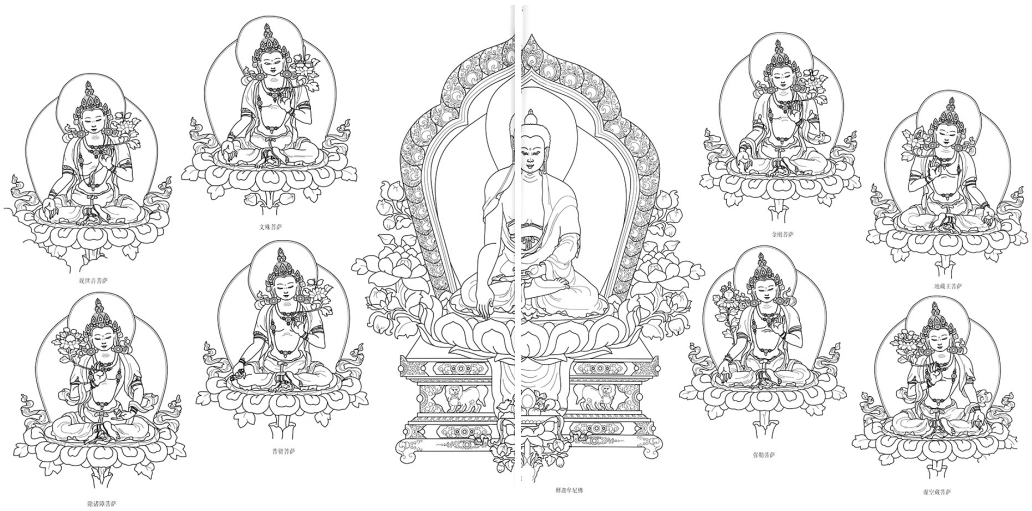


圖41 釋迦牟尼佛與八大菩薩銅像及畫像 梵華樓一室般若品樓上北壁陳設 六品佛畫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199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2a-b　裕陵地宮石刻（局部）　八菩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2c-d 裕陵地宮石刻（局部） 四天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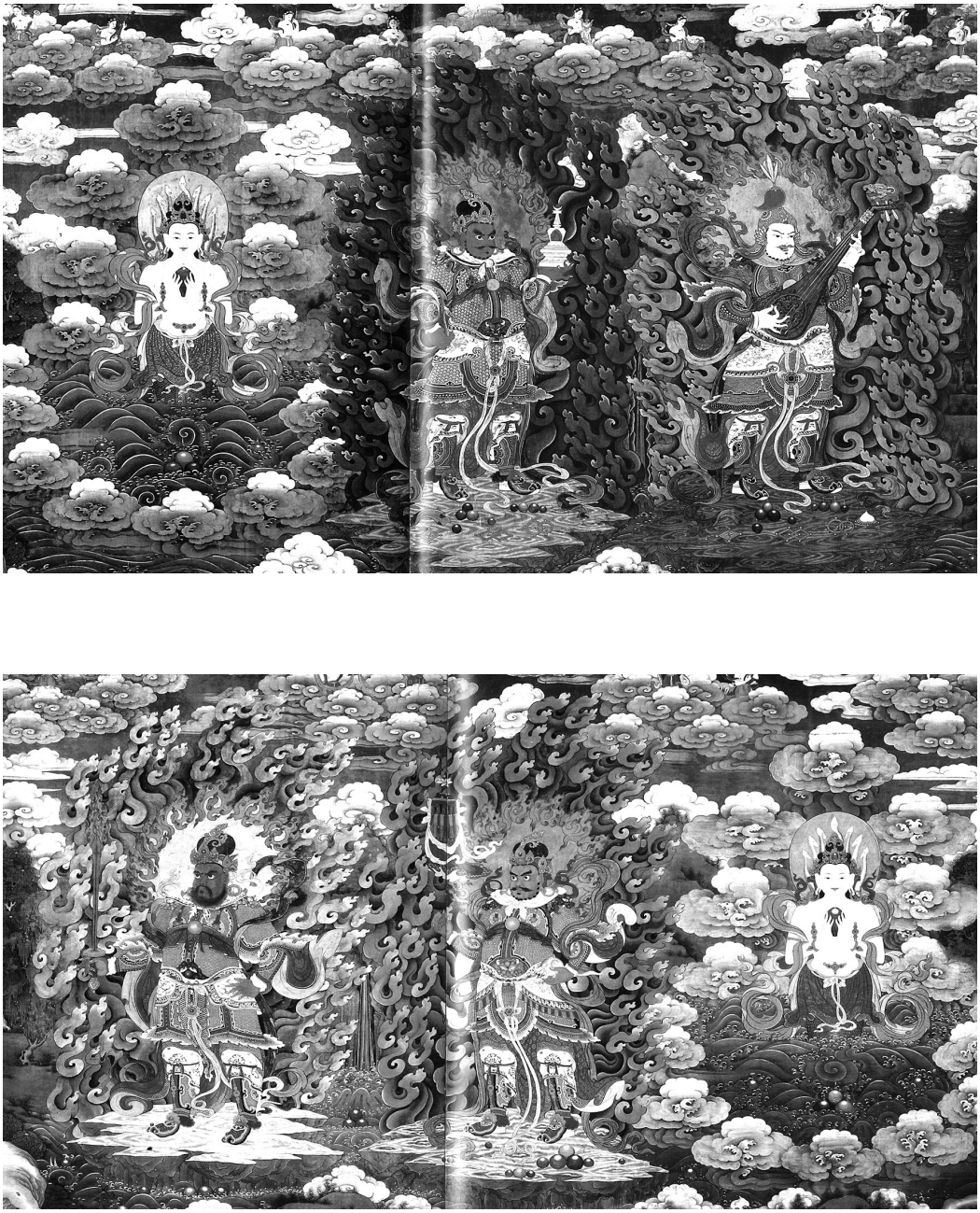


圖43　四大天王與龍王護法神畫像　梵華樓一室般若品樓下東西壁陳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4 丁觀鵬摹寫 乾隆御製貫休十六應真像贊（局部）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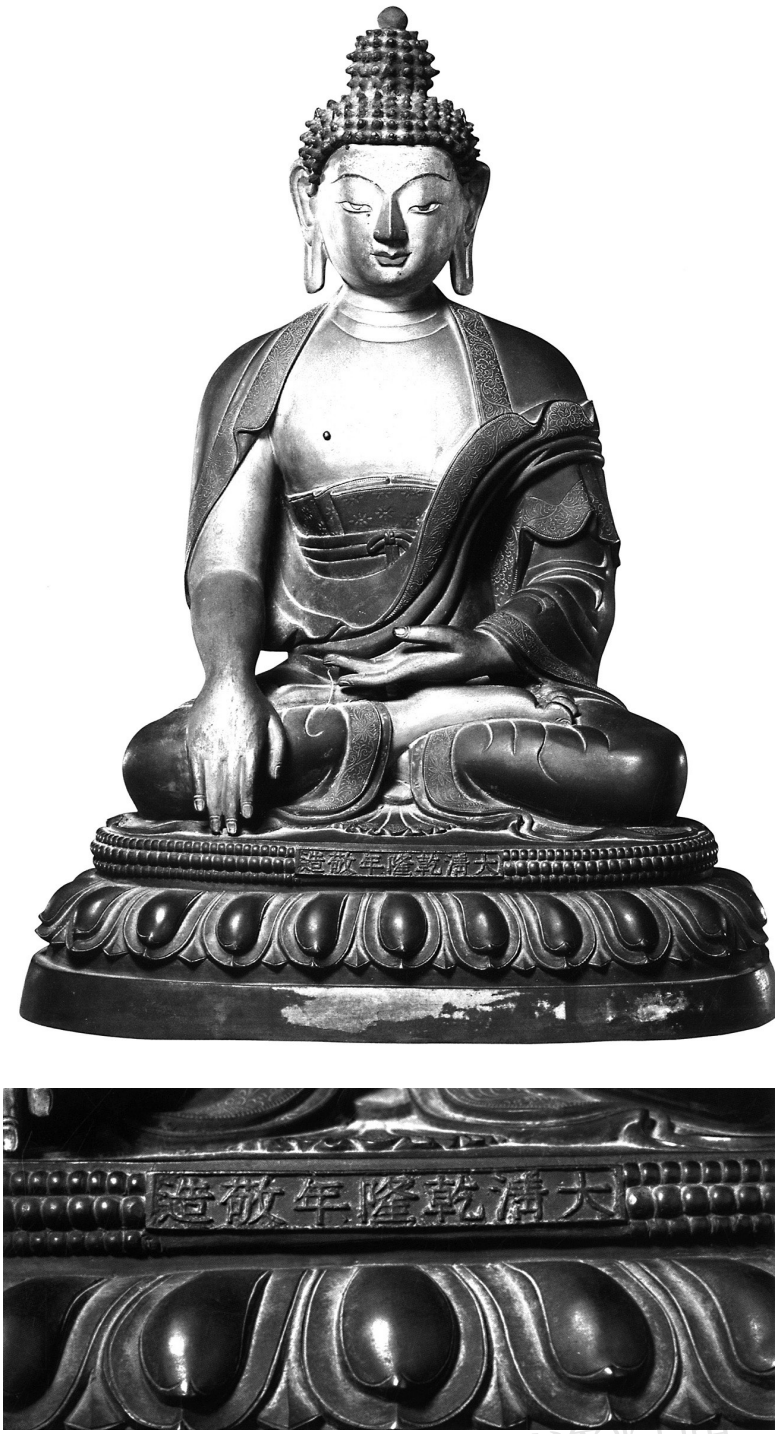


圖45 釋迦牟尼佛銅像 清乾隆 梵華樓一室般若品陳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199899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orshipping Myriad Gods for Auspicious Efficacy: Carved Lacquer Boxes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ligious Pantheons and Enshrined Scriptures

Zhan, Zhen-p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Drawing on a series of Six-class Buddhist Pavilions constructed in Beijing and beyond, as well as abundant statues and ritual implements enshrined inside them, recent scholarship on religious art at the Qing (1644-1912) court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nd Tibetan Buddhism. Due to the lack of extant artifacts and archival sources, the question of how Manchu Qing rulers perceived other religious traditions has yet to be fully explored. During the early Qianlong reign, a set of carved lacquer boxes were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in Suzhou to encase Daoist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crib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Carved images of numerous deities decorated on lacquer surfaces serve as rare evidence of the convergence of Buddhist and Daoist visual cultures at the Qing court, and they still remain obscur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style and deity formations of the scripture boxes, contextu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in light of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Qinggong Neiwufu zaobanchu dang'an zonghui*). It then reconstructs the distinct roles of Daoism and Buddhism in imperial patronage by focusing on Qianlong's scripture transcriptions and their interior displays.

Elaborately designed and combined as a whole, the lacquer boxes and imperially transcribed scriptures served as religious offerings enshrined at various Daoist and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Forbidden City. Despite the official emphasis on Tibetan Buddhism, Daoism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court rituals of the time. The Daoist and Buddhist pantheons on lacquer boxes offer a glimpse of Qianlong's religious cosmology, as reflected in his regular scripture copying and devout prayers to myriad deities for merit-making and efficacy. As the most important offerings until the down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sacred objects that offered blessings and protection not only for Qianlong himself but for the empire under the Manchu rule.

Keywords: Emperor Qianlong, Daoism, Tibetan Buddhism, carved lacquer pantheon, transcribed scripture offerings, religious sacred object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